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5 年 1 月 30 日第 46 期

## 本期目录

### 〔齐晋华文革研究专辑〕

#### 史林一叶

齐晋华 青岛“8·25”事件

齐晋华 乱中夺权的青岛 1967 年 1 月

附件 1: 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附件 2: 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三同志和我们的谈话（摘要）

附件 3: 苍茫大地 我主沉浮（摘要）

附件 4: 告青岛全市人民书（摘要）

附件 5: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摘要）

附件 6: 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敢死队一九六七年第一号通令

附件 7: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岛联络站就“1·22”大会的严正声明

附件 8: 从“1·23”黑会看王效禹（摘录）

附件 9: 特大号外

附件 10: 李水清回忆录（摘录）

附件 11: 潘焱 1967 年 9 月 23 日在北海舰队常委扩大会的检查（摘录）

#### 编读往来

边犊: 2014 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宗庶: 2014 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谢保安谈刘殷农回忆录

## 〔齐晋华文革研究专辑〕说明

文革研究在官方成为无形禁区之后，在民间却并未终止，各地都有“不为稻粱谋”的人们在默默尽着自己的努力，抢救历史记忆，搜集民间史料，探讨历史真相。总结历史教训。山东的齐晋华就是其中一位。

齐晋华（笔名），1950 年出生。文革爆发时为青岛市第十三中学初三（初 66 届）学生。1967 年 9 月进入青岛第四中学高中学习。1969 年 12 月参军。1974 年复员到青岛企业部门。从 1985 年开始收集文革资料，90 年代末开始研究青岛文革历史，2004 年扩展到研究山东文革历史。已完成有关王效禹的《齐鲁三年枭雄王》书稿（16 万字）和《一九六七年青岛文革日志》书稿（21 万字）。现正写作《1966 年至 1969 年青岛文革史》。

像齐晋华这样的有心人是各地都有的，他们今日默默的耕耘，终将取得明天的收获。

---

【史林一叶】

## 青岛“8·25”事件

齐晋华

说明：本文选自作者的《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青岛文革史》，删去一些人名和少部分内容。1966 年笔者 16 周岁，虽然活动的范围有限，不知道省市委上层的事情，但毕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一些事情的发生，并且在新世纪后研究了十多年。2005 年写出关于王效禹和“青岛 8·25 事件”的文章，2006 年以后，先后发到网上，有网友转帖，也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部分内容，但没有标明出处。现对原稿做了重大修改补充，再次发表，敬请指正。笔者的资料来源于：一、个人收集的大量原始资料；二、采访当事人；三、文革后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文献研究室、党史办、史志办等编辑出版的资料。

1966 年 8、9 月份，青岛爆发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8·25 事件”。毛泽东、党中央对事件作出批示，发了文件。周恩来数次下达指示，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当选政治局常委的陶铸给青岛打电话，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多次对此事件发表谈话。

事件还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同年 10 月 22 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登载了“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对事件的“调查报告”。

“青岛 8·25 事件”是以 8 月 25 日发生的事情命名的，但事件的前因后果却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即从 1966 年 6 月至 1967 年 1 月。

整体来说，“青岛 8·25 事件”主要由“6·25 事件”、“8·25 事件”、“8·26 事件”、“8·29 事件”、“9·1 事件”、“9·7 事件”等组成、牵涉到中央、山东省委、青岛市委、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市立医院等众多机关和单

位；涉及中央、省市委领导、青岛和外地大中学校红卫兵学生、青岛干部职工等数十万人；从而构成一个闻名全国的重大事件，也可称为“1966年青岛事件”。

因为此事件，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中央文革康生、王力等人指责为保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以及谭启龙、张敬焘的“保皇派”；全军文革小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被青岛造反派点名批判；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等人多次作检查、受批判；省委常委、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等被撤职；该事件还造就一位统治山东达两年多的全国著名老干部造反派王效禹。

## 一、省、市委强力领导下的青岛初期文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67号文件（有6份“附件”）发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28日的中发[66]281号文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等，主要成员有王力、关锋等人。

山东省委已于5月11日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仿照北京批判“三家村”，5月12日省委决定批判副省长余修、省委党校副校长李景春、《大众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丁秀生，3人被打成山东的“三家村”。

省委接到中央267号等文件后，迅速贯彻执行。5月27日《大众日报》发表两篇文章《戳穿余修的反动面目》和《揭开余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盖子》，当天下午省广播电台予以播发。

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于6月11日结束。6月18日，省委召开3.6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省委主要负责人出席，省长在讲话中点了余修等13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名。6月19日省委决定撤销山东师范学院副书记刘砥石和副院长刘明矾的职务，众多大学负责人相继被停职撤职。7月2日，省委常委25次会议决定揪出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委宣传部长王众音。7月21日，《大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省文联副主席、著名小说《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称他近几年的几篇作品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

1966年5、6月份的青岛市委有6位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张敬焘，书记处书记徐雷健在青岛，周化南在崂山县领导“四清”，陈友群病休，郑干在淄博参加“四清”，新上任的书记兼市长李元荣在德州参加“四清”。省委已经准备安排徐雷健到烟台地委任一把手，但他暂时留在青岛。

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6月14日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张敬焘，副组长徐雷健、李克（市委常委、秘书长），李镇（市委宣传部长）。下设办公室，李镇兼主任，副主任兰陵（市监委副书记）、梁云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董海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人。

6月15日，市委召开大会，张敬焄讲话，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分三步走：一、放手发动群众，鸣放揭发问题；二、对揭露出来的“重点人物”批判斗争；三、搞好建设，巩固运动成果。

市委经过研究，报省委批准，揪出市文化局副局长吴杰。6月19日，《青岛日报》刊登署名“文锋”的文章《彻底粉碎吴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定性“吴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是一个钻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聂元梓大字报6月1日发表后，当天晚上，位于青岛大学路、鱼山路的山东海洋学院（简称海院）大学生连夜贴出响应大字报。海院部分学生6月20日揪斗水产系主任尹左芬、地质系主任邱捷等14名教授、教师、干部，老教授们被罚跪、“喷气式”。6月21日，市委派宣传部长李镇到海院，对大学生一些粗暴行为提出异议。海院原属高教部主管，1965年6月3日，国务院批准山东海洋学院改由国家海洋局和高教部双重领导，以国家海洋局为主。该局是海军的下属单位。

山东省委6月28日派出由北海舰队军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海院。6月29日开始，省委工作组连续主持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院长曲相升、副书记高云昌、副院长许亮等先后在会上作检查。7月14日，院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曲相升等3人检查期间，由副书记冯起主持学院工作。省委工作组7月28日宣布：根据群众要求，市委决定撤销曲相升、高云昌、许亮等人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

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全力投入领导文化大革命，搞得众多文人和曾经有“问题”的干部人心惶惶。青岛市委当时统计，截止7月31日，全市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28万人，共贴出252万张大字报，有近11万人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经过各级党委研究决定，已被定为“痛加批判”的3465人，批判的6395人。

青岛除了点名批判吴杰等人之外，其他著名的案件还有：

6月13日青岛铸造机械厂王永乐等1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黑帮”；

青岛木器一厂领导层内部有矛盾，一些人与上级日用品公司意见不一致。6月22日贴大字报时引发厂内两派冲突，一派拿出武装部的枪支站岗保卫大字报，简称“木器一厂6·22事件”。此事件被市委定为厂长王民生、厂武装部副部长侯全德等人组织的“武装暴乱”案，上百人受牵连。

还有市委审查同意的6月29日李村师范学校李淑兰为首的“李纪周反革命集团”案，181人受牵连。

6月29日第十五中学批判“学生想领导运动”的“6·29事件”等等。

青岛市这些（约万名）经批准被批被斗的干部、职工、学生，以及受牵连的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大部分 9 月份后参与造反，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力军。

## 二、青岛市立医院“6·25 事件”

市立医院位于青岛胶州路、上海路。该院的“6·25 事件”是“青岛 8·25 事件”的起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市立医院党总支决定揪出批判的第一个人是内科年轻老实的孔姓助理护士。原因这位护士有两个哥哥在台湾，60 年代初饿肚子时期，她曾写信托人准备带到香港转台湾，要哥哥设法寄些食品到国内。这在当年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通敌”的重大嫌疑人，信件没出国就被截回，护士档案中有了“污点”。但她不知道，只是纳闷为什么台湾哥哥没有回音。

市立医院负责人 6 月 2 日在职工大会上宣布：内科揪出了孔××，党委“罢了她的官”。但孔护士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揪出她这样一位基层的普通护士？！

6 月 12 日，有人给一位耳鼻喉科的专家副院长贴出大字报。6 月 23 日全院统一行动，贴出大量大字报，他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当时，市立医院是青岛医学院（简称“青医”，位于黄台路、辽宁路、泰山路）的第二实习医院，青医有 27 名教职工长年在此工作，将近一半五年级大学生（80 多人）在医院实习。

聂元梓大字报在青医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教授挨斗，6 月 7 日晚间，学院召开“声讨黑帮大会”。6 月 8 日，党总支书记张立文在全院大会作报告《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6 月 9 日，学院教务处根据党委决定，并请示省教育厅同意，宣布不进行学期考试。

青岛市委 6 月 19 日派出 5 人工作组进校。6 月 28 日，山东省委派出由北舰军人刘同善等 5 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医学院。

6 月 25 日 6 时，在市立医院实习的青医第十小组大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开七病室内幕》，这张大字报脱离了医院党总支的部署。“七病室”是“五好病室”，工作出色，医院的标杆，不能随便批评指责，第十小组被戴上“攻击突出政治，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实习大学生不服，中午又贴出《呼吁书》，9 名大学生 18 时继续贴出大字报《严厉警告市立医院院领导》。

市立医院党总支连夜召开会议，院党政领导、各支部负责人参加，研究青医大学生大字报的问题，准备组织反驳。会议前，院领导向部分医护人员打招呼：现在阶级斗争很紧张，学生要来煽动群众，我们要争取群众。

25日晚上，青医9名大学生同市立医院卫校的几十名中专学生在医院的3、4、5、9号病房开会串联，鼓动这些实习的卫校同学解除顾虑，大胆地给党委提意见。开会时门外有人站岗放哨，引起市立医院人员的怀疑，他们要进去，里面顶着门，医院人员进去后与青医大学生在病房展开辩论，双方互不相让。

3病房值班的周姓护士以“妨碍病员休息”为理由，给院部打了电话，主持医院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张秀文（女，其夫是军人）要学生们立即退出病房，连续打了三次电话，大学生才离去。

当天晚上，市卫生局主持工作的王副书记，窦副局长等人赶到医院，与院领导一起，约22时对卫校学生批评教育。一些医护人员连夜写出反驳青医大学生的大字报。

第二天7时，医院党总支召开会议，卫生局王副书记、窦副局长等人参加。张秀文在会上布置：“今天注意，青医还会来闹事，要准备准备，最好说服不让进医院，实在来时，把他们引到礼堂去说理斗争。”

市卫生局、医院领导6月25日夜间接批评卫校的一些学生，他们不服，在青医大学生支持下，6月26日到市委上访告状。第二天早晨，医院负责人再次批评他们：为什么不通过我们党委就去？你们回去想想，别上青医同学的当，这是对你们的抢救政策。卫校停课2周，每个人做小结，数十人写检查。院领导在学生会上讲话：“要接受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教训。”

6月30日中午，青医一名五年级大学生在市立医院看大字报时被发现，医院人员上前询问，引发口角，青医学生被围攻。张秀文知道后，把医院的人员叫了回去。当天晚饭后，青医又有两名大学生到市立医院看大字报，又被市立医院的人员围住辩论，双方冲突，两名大学生吃了亏，一人被扭了胳膊。

此即“青岛市立医院6·25事件”。

7月9日，医院党总支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张秀文在会上提到“6·25事件”中青医学生的一些观点。

然而，派驻青医的省委工作组倾向学院的大学生，7月12日宣布省委决定：撤销院党委书记张立文党内外一切职务。党委基本瘫痪。对此项决定，青岛市委一些干部不认同。8月5日省委和市委工作组撤出青医、化院等院校，市委8月9日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青岛医学院、化工学院的问题，8月10日派李镇、兰陵分别到青医、化院“了解情况”。兰陵在青医表态：“青岛医学院党委没有烂掉，还要起来领导”等等，与已经撤出的原省委工作组的意见不太一致。大学生予以抵制，到市委送大字报。市委马上决定撤回兰陵，让他作检查，免去文革办副主任的职务。化工学院也批判了李镇的言行。

### 三、“破四旧”狂潮中的青岛“8·25事件”

8月3日晚间，青岛市委在汇泉广场召开大会，播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7月29日在北京的讲话录音，宣布撤销工作组。

8月4日，市委决定撤回所有工作组。各大学的党委已经基本瘫痪，学校呈现无政府状态，学生们自我管理。青医大学生8月11日组建了青岛医学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一把手是五年级管姓学生。海洋学院先成立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是66届海洋物理系姜、潘等学生，8月27日改名“红卫兵临时指挥部”。化工学院成立文化革命筹委会。

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学生 and 红卫兵之后，8月19日，济南在八一广场召开15万人大会，谭启龙讲话。

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张敬焘回到青岛，市委召开两次会议。一是8月20日在汇泉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二是张敬焘在市委等会议上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和省委会议精神以及中央的5份文件，有8月12日毛泽东、林彪的讲话，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8月14日关于中央领导人职务变动的《中共中央通知》，8月17日的中发[66]407号文件《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

青医大学生8月20日鼓动“6·25事件”挨批的卫校学生到市委上访，同时给张秀文写了大字报送到市立医院，与医护人员再次冲突。21日大学生又到市立医院串连。

《人民日报》8月22日首次报道北京地区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之后，8月23日青岛红卫兵也开始大规模的“破四旧”，当天达到高潮。上午以海院大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冲入天主教堂（圣弥爱尔大教堂，中国惟一的祝圣教堂），揪斗神职人员，焚烧宗教书籍。修女们被一街之隔的第七中学（女中）的女红卫兵押到学校关在教室中。红卫兵在教堂内到处搜寻所谓潜伏特务藏匿的电台，砸破2楼的木板墙时，发现里面有许多细的金属管子，于是欢呼找到了电台。实际上，这是一部珍贵的大型管风琴，2400多个声调，誉为亚洲第一，被彻底砸毁。学生砸开教堂大厅西侧第一任主教（德国传教士维昌禄）的墓地，拖出遗体在院中焚烧。笔者当天下午赶到天主教堂，目睹了已焚烧的尸体和宗教书籍。

一些中学红卫兵到爱国工商界人士家中抄家，居住在福山路养病的副省长苗海南和躲避在金口二路已病逝副市长陈孟元的家属这两家都被查抄，砸毁烧毁古董字画，抄走大量金银钱款。这两人都是电视剧《大染坊》的原型之一。

青岛市委面对突如其来的“破四旧”砸教堂等行为，一时无法应对。直到23日下午，才想出以有组织的红卫兵出面到教堂维持秩序，这个任务交给刚成

立的第三十九中学红卫兵营。市领导向 18 岁（高中生）的学校临时负责人和 17 岁（初中生）的红卫兵营长交代：教堂中有许多封资修的罪证，为了更好地批判，必须保留这些罪证实物，不能砸毁烧毁。三十九中 100 多名红卫兵 8 月 23 日晚进驻被砸被烧得千疮百孔的教堂，清除出去一些还在破坏的学生，关上大门。“四清”期间，市公安局的“四清”小组曾进驻教堂，这时公安人员简单介绍了情况。三十九中的几十名红卫兵在教堂中住了一个星期，不准其他红卫兵随便闯入，这期间没再遭到冲砸。

8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8 月 24 日上午 11 时许，上百名青医大学生到市立医院张贴两张大字报：《为纪念“六·二五”革命风暴两个月》和《“六·二五”革命风暴的真相》，批判张秀文对抗“十六条”，是反党分子，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大学生还围斗了卫校负责人，批判她是“保皇派”，与医院医护人员发生较大冲突。

当晚 19 时，数百名青医红卫兵又来到市立医院，要参加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秀文”的大会，医院予以拒绝。随后大学生步行到位于栈桥附近的青岛市委，在门前请愿静坐，要求罢免市立医院张秀文。加上围观看热闹的，已是数千人。市委秘书长李克出面接待，做说服解释工作，但学生对李克的答复不满意。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张敬焄马上召开市委常委紧急会议，深夜约 23 时作出决定，张敬焄出来宣布：“根据同学们现在揭发的问题，市委决定罢张秀文的官。”

“罢官”原本是权宜之策，先暂时缓解红卫兵的情绪。但大学生们听到“罢官”，立即集合队伍返回市立医院，准备连夜斗争张秀文。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梁云桥接到正在市立医院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董海山的电话，梁要张先躲一躲，董海山马上带领张秀文离开医院躲避。

市立医院知道张秀文被撤职后，卫校的一些学生不满，赶到市委，李镇出面接待，这些中专学生反对罢张秀文的官。张敬焄听了李镇的汇报后说：“最好叫张秀文躲躲。”

8 月 24 日深夜至 25 日凌晨，青医大学生在市立医院没有找到张秀文，在青医驻市立医院个别教师的协助下到处抓人，先后抓了卫校负责人、药房主任、外科副书记、医生护士等 12 人。经过审问，释放了医院工人和 2 名病号。红卫兵在医院门外胶州路与上海路交叉口处，批斗 9 名医院的干部和医护人员，让他们跪在桌子上，揪头发，脸上涂了墨汁，轮流戴纸帽子，有的衣服被撕破。

市委得知青医红卫兵在市立医院的行为，25 日凌晨派李克到现场宣布市委已经决定撤销张秀文的职务。25 日晨 4 时，按照市委布置，董海山向张秀文传达对她撤职的处分。



8月25日上午，青医大学生又来到市立医院，占领党总支办公室，砸碎玻璃进入广播室，向全院广播：“张秀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些红卫兵到位于贮水山路的张秀文家揪斗她，张的丈夫是北海舰队正师职干部，院中还有其他军队领导干部。红卫兵与门口警卫战士冲突，张秀文从家中出来，把手表交给家人，红卫兵把她揪到单位继续批斗。

市委下午到医院传达对张秀文的处理意见，大学生闻讯赶来，占领讲台，批斗张秀文，还把多名医院的职工作为“保皇派”揪到台上进行批斗，有人被打。市委派李克前来医院劝解，被青医红卫兵轰了出去。

25日下午，李克通知一位市委负责人，青医大学生要找他们。这位负责人马上安排汽车，匆忙乘车离青赴外地上任去了。当地的地委林书记给省委打电话，接任的来了，他准备到省里报到，但被告知，不要交接，仍留在当地主持工作。

当天下午15时，面对混乱的局面，青岛市委召开常委碰头会，决定加大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工作人员送来一份青医一年级学生印发的传单《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有人汇报：青医红卫兵写了“公开信”，呼吁向市委开炮，并要电台广播。还有人汇报大学生要开万人大会斗争张秀文，会后还要捣毁市委等。这些汇总的消息有些是不真实的传言。

张敬焄给省委书记处打电话汇报青岛的局势，谭启龙知道后表态：告诉张敬焄，不要怕，要经受考验，要准备戴高帽子，游街，挨打，准备牺牲，得空就讲“十六条”等。曾任省公安厅长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向张敬焄传达后说：他们开万人大会，你们可以组织人参加，和他们辩论。对他们的传单，你们也可以写出传单逐条加以驳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让干部有思想准备等。

张敬焄向市委常委传达了省委负责人指示，经过研究，制定3条措施：

一、通知城市“四清”工作团队员待命，参加斗争张秀文的“万人大会”，准备参加“辩论”。

二、组织写作班子，起草“反驳”的传单。

三、由李克通知卫生局王副书记，到市立医院组织保护张秀文，防止被青医大学生拉到医学院批斗。

市委还决定，分别召开各口负责人和各区负责人两个会议。17时至20时，在兰山路3号先后召开的两个会议上提到今晚学生可能要采取行动，要组织干部、职工上街“宣传十六条”，主要地点在市委、市立医院周围。全市党群政法口、财贸、城市四清工作团、文教卫生系统等等，都做了动员准备，一些队伍连夜上了街，其中有些队伍来到青岛医学院门前。

晚上21时多，台东医院副院长在青医门口宣传“十六条”，辩论时被学生抓入校内关了起来，双方矛盾激化。

按照市委布置，青岛广播电台广播“十六条”，反复重点广播其中的“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和“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两部分，强调“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8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红卫兵在青岛市委门前也出事了。

25日下午，化工学院桑姓等学生收到西北工业大学同学的来信，得知“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黑帮分子”镇压西安大学生的“革命行动”。消息传开，化工学院和橡胶学校师生深夜联系距离不远的公交公司，约400人乘坐4辆公交车，26日0时30分来到市委门前，要求市委落实西安的情况，他们准备发表支持西安大学生的“公开信”。

市委周围有很多奉命前来宣传“十六条”的职工队伍，他们已经知道青医大学生与市立医院的冲突，20时左右又获悉大学生要冲击市委，已经严阵以待。

半夜时分，化工学院的学生来到市委门前，要求到西安串连，他们与青医大学生没有联系，并非来冲击市委。市委周围的职工不知道，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目的。从化工学院1966年9月8日印发的《以张敬焄为首的青岛市委一小撮“老爷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镇压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的传单中可以看出，职工们“围上去念十六条”。但大学生对半夜三更围着他们念“十六条”的行动莫名其妙，听职工们念还不如自己学，学生们大声背毛主席语录。职工、学生的声音混合起来，一片噪杂，双方形成对峙，然后辩论，最后引发冲突。因为职工太多，化工学院留下3名同学，其他学生赶紧上了来时的4辆汽车撤退，车上的几块玻璃被砸碎，留下3人遭到围攻。

约400名化工学院大学生刚走，上千名海洋学院的师生员工又来到市委。1966年9月16日海院印发传单《青岛市委策划的“八.廿六”、“九.一”反革命事件的真相》中记载：“海洋学院的广大革命师生于八月廿六日深夜一点多钟，收到化工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印发的关于揭发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镇压革命学生的‘八.一五’案件的通知后”，“一致要求立即派代表团赴西安慰问和支持西安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为此，我们排着队伍，敲锣打鼓来到市委门前”，“当二点半左右我们队伍到了市委门前时，却早已有许多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迎上来，立即包围了我们的队伍”。海院学生就“西安八.一五事件”“向市委提出了二点要求：1.问市委以前是否知道这件事？2.要求迅速派代表团去西安，表示支持和慰问。”“市委一位负责同志讲：没接到上级通知，不知道‘八.一五’案件”；“派代表团由你们根据《十六条》自己决定。”大学生认为市委“态度很不明朗”，在市委门前与职工群众激烈辩论。

海院大学生被围在市委门前的时候，市立医院24日晚和25日被打的9个人，

6时多用救护车拉到市委门前，这几个人不是海院学生打的，但数千职工群众不清楚，只知道是大学生打人了。职工围住海洋学院的学生，呼喊“资产阶级造反无理！”、“打倒右派学生”等口号，双方情绪越来越紧张。

张敬焄出来讲话，肯定学生们的革命大方向，要求学习“十六条”，欢迎贴大字报。并说：“西安事件我们不知道，同学们组织去，市委同意。”海洋学院的学生回到学校。

8月26日0时以后，也可以说是25日的后半夜，青岛医学院、化工学院、海洋学院红卫兵到市委请愿静坐，以及与职工群众的冲突，就是闻名全国的“青岛8·25事件”。

#### 四、矛盾激化的“8·26事件”

8月26日0时以后至7时，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大学生，先后两次在栈桥附近与保卫市委的职工两次冲突，各单位很快知道大学生去“冲击市委”了，但不清楚是哪个学校，一些单位认为又是青岛医学院。

凌晨2时左右，各区区委、团市委、市卫生局、文教系统、部分工厂企业等紧急动员，集中人员，先后赶往太平路市委驻地，青医黄台路院部和泰山路二院，江苏路青医附院，胶州路市立医院这5个地方，宣传“十六条”，到黄台路去的最多。3时30分左右，青岛卫校、台东医院等单位的队伍首先到达辽宁路、黄台路。天很快亮了，青岛医学院周围人山人海。青医大学生晚上并没有去市委门前请愿，面对汹涌而来宣传“十六条”的人潮，有着极大的逆反情绪。青医门前的职工队伍呼喊口号：“保卫市委”“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双方冲突，挨打人员中大学生的人数要多。

青医附院是医学院的下属医院，约百名青医教师和大学生在院工作、实习，很多医护人员与大学生的观点基本一致。市卫生局的宣传队伍在局领导的带领下，来到医院附近宣传“十六条”，对此有抵触的医院上百人9点钟也列队到医院门口敲锣打鼓地进行宣传。市话剧团、京剧团、文工团等文艺团体的队伍赶到青医附院，与卫生局的队伍汇合，吹喇叭奏乐压制医院的锣鼓声，双方严重对立。医院人员很快认出卫生局队伍中的局领导，拿出照相机拍照，话剧团的鼓被抢到医院院中，双方冲突。卫生局和话剧团的队伍冲入医院，与医护人员等在院中辩论。市委派梁云桥赶到医院宣布：我是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梁云桥，各宣传队离开。话剧团等宣传队撤出医院，青医附院的高音喇叭呼喊：“市委的阴谋破产了，逃跑了！”

院中的吵闹喧哗影响了住院病人，正在住院的国棉六厂工人孙相银（退伍军

人)，治疗腿部的退伍军人于世军，纺织疗养院转来的纺织职工何典等人非常反感。

这几天医院还发生了当时不为人们注意但后来却引起轩然大波的事：8月25日，医院26岁女病人徐成媛因病去世；8月27日晨6时，16岁的女病人陈秀英因病去世。

青岛职工和大学学生的冲突逐步加剧，为防止事态扩大，8月26日下午，市委发出四条指示：

- 一、大型的宣传一律停止下来，主要搞小型，不要到市委驻地附近去宣传；
- 二、动员群众不要参加学生的辩论；
- 三、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 四、给被围攻的学生解围。

可是很多职工到市立医院慰问被打人员，对青医少数红卫兵的行为很气愤，职工和大学生对立的情绪一时难以平息。26日全天，职工们包围青岛医学院等学校，大学生们则连续围攻学校门口宣传“十六条”的人员和汽车，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8·25事件”使原本联系并不紧密的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这“三大院校”的大学生走到一起，成为一派。

26日约16时，“三大院校”传开消息：“毛主席来电报了，派人来了！”师生们兴奋了，2000多名“三大院校”和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傍晚在黄台路青医院内召开庆祝大会。大学生们互相查问，但没有找到“毛主席电报”。

闻讯而来的职工宣传“十六条”的队伍包围医学院，扩音器向院内高呼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准打人！”

青医、海院等少数在外面的大学生被职工包围，青医院内的人员知道后，2000多名红卫兵大学生手挽手于26日20时列队冲出校门，敲着鼓向市委方向前进，周围职工中的便衣人员报告上级：学生“拿着大鼓”，经层层上报，到了市委，“拿着大鼓”变成了“拿着大斧”，市委迅速向省委汇报“大斧”的信息。

2000多名拿着所谓“大斧”的学生队伍，很快被数万名职工“围追堵截”，分割包围在辽宁路、胶州路、中山路、湖北路等一带，冲突中大学生吃了亏。市委和人委派出干部到现场劝解职工，27日凌晨3时后，大学生红卫兵返回校园。

化工学院数百人的队伍在职工的包围圈中难以返校。27日凌晨3时，一名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在喇叭中呼喊：“革命的职工同志们，革命的小朋友们，时间很晚了，闪开一条路，让同学们回去休息吧。”

这就是“青岛8·26事件”。

“三大院校”8月27日联名发表《最最最紧急呼吁》，到济南、北京等地散

发，第一句：“青岛发生严重事件，文化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策划了反革命阴谋，全市以学习十六条为名，用四万人将三大院校包围住，并发生斗争学生的严重事件，有一百四十名受伤，二名前肩骨折，打晕一人，二千多名学生被斗，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等等。

这一阶段也是“破四旧”的高潮中，第三十九中学等红卫兵队伍 8 月 23 日来到青医附院，与医护人员一起，把青医附院改名为“青岛白求恩医院”。但 25 日来的市城建局宣传队伍的一些人认为应该改为“青岛医院”，双方一场辩论。27 日又有队伍到青医附院张贴大字报，与正在住院的残疾退伍军人于世军、崔姓护士等人冲突，把医护人员等推到大门口，双方激烈辩论，职工队伍中有人呼喊“打倒反革命”等口号。

在青医附院 6 病房住院的国棉六厂工人孙相银，纺织工人何典等人，8 月 28 日串连 6 病房祁姓、赵姓等病人，联名油印散发《青岛白求恩医院七位住院病员给全市工农兵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孙相银第一个签名，支持“三大院校”学生。这份 28 日的“公开信”。当时没有提医院近日死亡的两女病人。

济南 2000 多名红卫兵 8 月 27 日晚间上了到青岛的火车，济南有关方面马上通知青岛。随后北京、上海、天津、华东、东北、西北等地 40 多所大中院校数千名红卫兵，先后到青岛串连。

外地赴青大中学校红卫兵到青岛后，陆续发表数十份“调查报告”和传单，很快分成两大派，多数支持“三大院校”造反大学生，少数倾向青岛市委和职工。

支持造反的主要有山东大学、清华、北大、人大、中国科技大、中央美院、北航、北京化院、北京矿院、北京钢院、山东师院、山东工学院、山东财经学院、河北师院、东北工学院等赴青红卫兵。

倾向市委和职工的有山大物理系、哈军工、西安工学院、东北林学院、浙江大学、华东工程学院、北京师院附中、清华附中、山东实验中学、济南一中等。

另外，既支持“三大院校”批判张敬焄，又批评大学生打人行为的有天津农机学院、山东商校等。

山大张岱基等 9 名“保守派”红卫兵组成“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8 月 28 日到达青岛。经过几天走访调查，9 月 2 日写出《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油印散发，认为该事件是青医一些大学生，利用市委罢张秀文官的错误，违背“十六条”打人，引起群众不满而发生的。

山东商校董兴长、刘胜云等 4 名赴青学生，经过十多天的采访，写出 6 万多字的“报告”，批评“张敬焄同志”犯了错误，支持谭启龙到青岛处理发生的问题，达到“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9 月 17 日由印刷厂印成 117 页约 32K 的书籍《青岛事件调查》，加上谭启龙讲话等“附件”共 7 万多字。

## 五、谭启龙第三次到青岛及“8·29 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 7 月 7 日和 8 月 22 日已两次到青岛。

8 月 25 日，青岛“内乱”，市委上报省委，省委上报中央。驻青岛的陆、海军等部队也分别向上级汇报。

谭启龙准备亲自前往调查处理，省委 26 日首先派省计委副主任刘鹏等 4 人组成先遣小组赴青岛。

周恩来 8 月 26 日针对“青岛 8·25 事件”，电话指示谭启龙：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

谭启龙 8 月 27 日傍晚带领省委秘书长于明任组长的调查组乘飞机赴青，这是文革开始后谭第三次到青岛。调查组成员有省委办公厅张少甫、王济夫、宋桂植、江祥康等。到达青岛后连夜听取了张敬焘等人的汇报。午夜时分，接着研究接待外地串连学生的方案。

谭启龙乘坐的飞机停在海军流亭机场，北海舰队负责人知道了。8 月 28 日中午，主持北舰工作的第二政委卢仁灿，主要负责人常务副司令员潘焱礼节性拜访谭启龙。

省委调查组的人员分头到青医等“三大院校”找学生，以及有关人员谈话，了解情况，当晚汇总后汇报。

8 月 29 日凌晨 2 时，谭启龙在北舰东海饭店（北舰第一招待所）开会研究《关于青岛 8 月 25 日事件的调查报告》，会上对张敬焘有两种意见：一是“罢官”；二是“停职检查”。北舰卢仁灿是市委常委，他认为“张敬焘来青岛工作还是好的，是革命的”，卢倾向“停职检查”。

会议结束，天已亮了。谭启龙乘飞机回到济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青岛问题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同时，省委中午向青岛发出电报：

青岛市委转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省委常委听取了省委调查组组长于明同志关于青岛八二五事件的调查报告，鉴于张敬焘在此事件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为此，省委已经做出决定，并已向中央写出报告，在中央对此事批复作最后处理前，省委决定，责令张敬焘同志先行向青岛医学院、青岛海洋学院（注：原文）、青岛化工学院（原文）革命师生员工工作诚恳及深刻的检查，听取大家的批评。

特此通知。

中共山东省委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青医学生知道了省委的电报，下午到市委会议室批判张敬焄，同时通知他晚上参加“三大院校”召开的“革命造反誓师大会”。济南 2000 多名串连红卫兵已经于 8 月 28 日早晨 6 时到达青岛，很多人来到青医支持造反，随后，北京等地的大学生也来了，青岛大学生的力量得到加强。

市机关工委 16 时电话通知位于青医斜对面德平路第二体育场：晚上开大会，做好准备，安装扩音器安排会场。

市委下午在兰山路 3 号开会作了研究分析，向省委汇报大学生要召开“誓师大会”。省委察觉到青岛红卫兵的动向存在潜在的问题，谭启龙亲自给张敬焄打电话，“市委出席会议要集体参加，不要个人参加。”

按照市委的布置，李克 19 时电话通知副市长郭士毅等人，组织港务局等工厂企业数千名职工，准备到体育场保卫市委负责人。

但张敬焄想与大学生面对面地做工作，提出“大家在家注意动向，我去”。“三大院校”红卫兵 20 时到市委，带着张敬焄坐车开往会场时，被一群职工截住，职工不让张去参加会议，他对职工们说：“我如果不去，说明市委更有问题，回来也不好向党交待。”

第二体育场的大会主席台上主要是“三大院校”大学生，分别是海洋学院红卫兵临时指挥部总指挥，青岛医学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化工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的领导，清华大学赴青串连的一名大学生（家在青岛）负责记录。张敬焄到场后时间不长，就被从台上赶到台下。

体育场挤满了上万人，登记参加会议的有青医、海院、化院、清华、团市委、青医附院、市立医院、冶金学校、卫校、橡胶学校、二商校、市南木器厂、国棉一厂等 54 个单位，其中团市委、国棉一厂等只是极个别的一般人员到场签名。笔者当时是 66 届初中学生，也在场。

大会由海院一名大学生主持，22 时宣布开会，全场齐读毛主席语录，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宣读省委电报。

青医大学生首先作揭发批判发言。团市委的吴姓干事在发言中提出三个问题，认为市委有组织地围攻青医。

在青医附院住院治疗腿部的拄拐退伍军人于世军上台发言，陪同的是一起住院的何典，于为主，何插话补充。他们发言说到 8 月 26 日围攻青医附院时两名女性病人死亡，认为是被吓死的，提出要为死去的阶级姊妹伸冤报仇。这番带有煽情的讲话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台下众多大学生和群众质问张敬焄，要他站起来。随后上去几个人，把张押着跪在台下，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上大牌子，挂牌

子的铁丝接头连续多次刺到他脖子后的皮肤。

上台批判的还有市南木器厂、国棉一厂等单位的职工，正式发言共有 7 人，非正式的有多人。

会议进行之中，冀鲁针厂副厂长于泳湖和保卫科副科长毕春海回家路过体育场时进来看看，被厂里一名与领导有矛盾的职工发现，指责他俩是“保皇派”。周围的红卫兵不问青红皂白，抓住两人押到台前跪下，一起批斗。

批斗会 8 月 30 日凌晨 2 时 30 分结束。把张敬焘押上吉普车开到大门口又被一些人拦住，把张拽出后又押着跪在车头上。近 4 时才把他送到太平路 37 号市委灰楼的会议室休息。

此即“青岛 8·29 事件”。

现场批斗会中，市委安排了一些机关干部、公安便衣在其中，以防不测。

第二体育场与六十七军军部一墙之隔，军长李水清等负责人反感造反大学生的言行。有位军领导要求派部队救出张敬焘，被理智的李水清制止。六十七军派了便衣人员到会场观察了解情况。

30 日上午 9 时许，部分学生又在市委灰楼前批斗张敬焘，让他跪在地上，一只手扶住头上的高帽，一只手拿着麦克风作检查，正值 8 月份的酷热，时间一长，张晕倒在地，下午被送到人民医院。

青岛的批斗会很快汇报到济南。省委 8 月 30 日 13 时 30 分发出电报，青岛 14 时收到译出：

青岛市委并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为解决青岛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省委谭启龙同志已去青岛亲自处理此事，在谭启龙同志未到达青岛之前，请同志们、同学们保证张敬焘的人身安全，我们完全相信同学们会同意这一意见。

中共山东省委

八月卅日

8 月 29 日夜间的批斗会，造成混乱，少数干部群众加入批判市委和张敬焘的行列。市南区委书记鞠维信于 8 月 30 日布置区委办公室主任写了《揭发张敬焘的严重问题，做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和《向革命小将致敬》两份大字报，鞠鼓动区委副书记、副区长等 23 人一起签名，分别张贴于湖北路区委门前和大学路海洋学院门前。青岛疗养院党委副书记 8 月 28 日、9 月 2 日等几天，连续向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汇报青岛职工和大学生的冲突情况。这两人后来成为王效禹的“战友”。市委社教工作团第七工业大队队长串连大多



数队员，于8月30日贴出大字报，要求改组市委，撤销社教工作团工业大队。

对于8月29日于世军、何典在批斗会上宣传8月26日青医附院死亡的两名女性，在此之前青医附院没有人提出过。青医文化革命临时领导小组当时还不清楚，他们8月30日印发的第一期《革命情况简报》中写的是：“两位患心脏病的阶级弟兄因受惊扰过度而死亡”，“对死去的两位阶级弟兄表示默哀”。说明他们还不知道死者是男是女。

## 六、谭启龙第四次到青岛与“9·1事件”

谭启龙8月30日上午在济南向中央汇报，陶铸电话指示：“现在张敬焘处境危险，你要出来为张讲话，必要时可以罢官，但可以向张讲清楚。”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等人当天下午乘飞机再赴青岛，秘书从流亭机场给北舰打电话，要求住在东海饭店。傍晚谭启龙等人到达，向卢仁灿说明受中央委托而来，已作了最坏打算，只要求军队如果出了什么事能向中央报个信。当晚他们住在招待所，第二天搬到荣成路4号。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段毅任组长的省委工作组也赶赴岛城。谭启龙等人的安全主要由市公安局四处和六十七军负责，北舰保卫部仅在广西路4号等地设立观察点，收集有关动态。

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等人给驻青岛的六十七军、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等打电话，要他们注意保护济南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安全。

青岛乱了，有着青岛市委常委职务的卢仁灿（8月25日从北京回青岛），对于是否参加研究地方文化大革命会议的问题，电话请示海军。苏振华答复：通知了，还是要去参加，注意同陆军行动一致。苏振华请示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后，9月1日下午又给卢仁灿打电话：参加会议问题，军委已批准了。

8月31日15时，省委工作组召开有线广播会议，主会场在市政协礼堂，“三大院校”及外地师生代表200余人参加，谭启龙主持并讲话，另外约2000人在人民会堂听广播。谭启龙在会上批评张敬焘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宣布：“省委已报请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同志第一书记的职务，并且决定，李元荣同志代理市委第一书记。”“市监委副书记兼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兰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梁云桥，也犯有严重错误，决定分别给予撤职处分”等。谭启龙还谈到：张敬焘在关键时刻犯了错误，他在过去的工作中，还是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的。

李元荣原任省商业厅长，1965年9月到德州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4月19日在青岛六届一次人大会议当选市长时，他还在德州搞“四清”，8月21日才从德州到青岛，原市委二把手25日离青到烟台去了，李元荣升任青岛市“临

时”一把手。

8月31日下午谭启龙在市政协礼堂讲完话后，会场一片沉默。突然，青医的一位教师大声提出异议：“我不同意省委的决定，我强烈要求撤销张敬焄党内一切职务，痛加批判，并要求改组青岛市委。”会场中的红卫兵鼓掌并呼喊口号。在青医附院住院的于世军、何典，来到会场又一次讲起8月26日医院被围攻和死亡两名病人的经过，再次引发会场骚动。谭启龙按照红卫兵的强烈要求，约17时派市长与2名红卫兵把张敬焄从人民医院带到会场，接受批判。红卫兵大学生做出决定：明天在东方红广场（汇泉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张敬焄。会后，张被送到太平路37号市委招待所。

大会约20时结束，谭启龙马上召开市委会议说：越谈越嚣张，要改组市委、报社，占广播电台，要开10万人大会等等。谭迅速向中央汇报。

张敬焄再住在人民医院，已经不安全了。9月1日凌晨约4时，应该是经谭启龙同意，市武装部的军人和市委副秘书长把张送到浮山所的海军401医院，同时把张敬焄的夫人送到沙子口派出所保护起来。

401医院李副政委打电话向北海舰队汇报，卢仁灿电话请示苏振华，苏答复：可以收下住院。苏振华再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后，9月1日下午给卢仁灿电话：“关于张敬焄住院。刘志坚已经批准了，要好好给予治疗，注意保密，保证安全，要派强的干部掌握，做好红卫兵的接待工作。”

张敬焄（化名王海）住进401医院高干病房2病区，北舰党委常委专门开会研究，卢仁灿与后勤部长潘友宏部署保护张敬焄，防止红卫兵冲击的方案，派舰队后勤部政治部韩主任（副师职）带领的工作组进驻医院，张当晚转空勤科。工作组有9名专职保卫人员，7人分管病房警卫，2人外勤搜集社会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张敬焄住院47天，这期间以及9月30日、10月1日，卢仁灿、潘焱、邓龙翔、张元培、赵汇川、张晓冰、李镜如等舰队领导，先后多次到医院看望，六十七军李水清委托政委陈继德到医院慰问。这些，在王效禹、杨保华等造反派掌权后，成为北海舰队“保护走资派”的“罪状”。

张敬焄是1960年11月被调任青岛一把手的。

在之前的1960年夏天，不长时间里，青岛市下属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山东省委1960年8月3日批示：同一个大队同一个情况两份调查反映的情况和分析有很大出入：一个是死82人，一个是死159人；一个是年老有病而死，一个是因水肿病生活问题而死。如此严重的问题是从千里之外的一封来信反映出来的。这是因为党内有部分干部存在着严重官僚主义作风，歪曲事实，甚至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打击报复。

即墨县饿死人等严重问题的责任追到市委第一书记头上。

中央 1960 年 9 月决定恢复华北、华东、东北等各中央局，华北、东北等大局先后成立。只有华东局，中央要处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问题，暂缓宣布成立，实际已经重建。

1960 年 10 月 9 日至 22 日，还未宣布成立的华东局以及山东省委，连续在济南召开华东地区农业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谭震林、柯庆施等人出席，处理舒同问题。华东局报中央同意，柯庆施调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敬焄到青岛任第一书记，一是处理饿死人等问题，另外还准备处理曾经的市委主要负责人。在济南参加会议的陈丕显电话通知上海张敬焄立即前来开会。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张敬焄 10 月 24 日来到青岛，正式任命 11 月 2 日下达。他首先全力申请调拨粮食，解决迫在眉睫的饿死人等严重问题。11 月 4 日市委提出贯彻省委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紧急指示的意见，指出青岛农村灾情严重：1. 全市粮食总产量只有 55683 万斤，比 1949 年总产量减少 3.3 亿斤，扣去种子……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不足 190 斤，即墨不足 120 斤。2. 劳动力比 1957 年减少 11.7 万多人……浮肿病人约 10 万人，即墨县的出生率呈负增长。市委要求各级党委认识灾情的严重性，度过灾荒。

1962 年，张敬焄按照中央、华东局和省委布置，开始甄别青岛市众多干部、知识分子的“右派”、“右倾”等问题。

张书记在青岛任职期间，基本上是得人心的。1966 年 8 月 31 日，“张书记被撤职”的消息，在青岛市迅速传开，引发干部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另外，文革初期，各级党委基本按照 50、60 年代历次运动的经验惯例，布置并且组织在本地区本单位抓各种各样“黑五类”式的反面人物。一些干部和职工群众认为造反的大学生中有“右派”学生，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

8 月 31 日傍晚，上万人先后分别汇集市委和人民会堂两处的大门前，彻夜静坐抗议，大会决定向中央发出急电：“要求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8·25 事件’真相，作出正确决定”。先后向北京发出三封电报，打了三次电话，强烈要求恢复张敬焄的职务。市委门前的大会自主选出青岛化工厂车间团支部委员夏乃健、海水养殖二场场长赵养衡、药检所关美君、人交公司逢积厚、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支持市委的张岱基等 4 名大学生等共 11 人为主持人，夏乃健身穿海魂衫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大街上张贴“张敬焄无罪”的大标语。

周恩来 9 月 1 日凌晨 2 时左右从北京给在青岛荣成路 4 号的谭启龙打电话。对大学生要求召开 10 万人批判大会表态：在双方存在纠纷的情况下，建议不召开那样大型的会议，可以召开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来还指示谭启龙：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出面做好两派双方的

工作。

需要说明，1961年5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给谭启龙的任命是“济南军区政委”，不是“第一政委”，他是“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前任舒同1956年7月和后任王效禹1967年5月的军委命令，都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决定9月1日凌晨传达总理指示，并向六十七军借来军装。郭士毅3时在市人委主持紧急会议，副市长于波等人出席，传达周恩来讲的4个要点：

1. 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问题，由青岛市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2. 青岛市委和张敬焄同志的问题，由青岛市工农兵学商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3. 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文斗，一定不要武斗。文斗就是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

4. 今天（9月1日），由大专院校在汇泉主持召开的10万人声讨张敬焄的大会，党中央指示立即停开。

协商会议准备9月1日下午召开，当场分配了代表名额。早晨5时多，会议结束，分头筹备。

在市委、人民会堂门前彻夜静坐的干部、群众，9月1日凌晨4时50分通过《青岛市革命群众自发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决议》（简称“六条决议”）：

1. 撤销省委工作组对张敬焄同志所作的错误处分决定。

2. 恢复张敬焄同志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继续留在青岛工作。

3. 严厉惩办凶手。

4. 要立即释放被扣押的革命群众，违者罪加十倍。

5. 大专院校、专业学校的红卫兵，要进行审查，保证红五类子弟参加，非红五类子弟立即铲除。

6. 以大会的名义向张敬焄写慰问信。

9月1日早晨，在市委门前播放谭启龙的讲话，传达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讨论决定”，“张敬焄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郭士毅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谭启龙的讲话，以及“六项决议”等经群众流传，很快演变成中央已恢复张敬焄职务的传言。

“台东区区级机关全体革命同志”迅速贴出大字报和散发传单《又一个更大的好消息》，宣布：“毛主席亲自来电：完全支持全市工农兵的正义要求，立即恢复张敬焄同志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青岛市北区人民检察院、市北区人民法院全体革命干部”印发《紧急通令》、《紧急呼吁》等传单：“我们命令青岛三大院校及混在各地来青革命师生中的一

小撮反革命分子在 24 小时内（9 月 1 日 12 时至 9 月 2 日 12 时）立即向本市政法机关投案自首。”

“煤建沧口经营处全体革命职工”发出《最后通牒令》：“把所有右派反革命学生，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及摧残张敬焘同志的法西斯分子交出来”。

《青岛日报》社印发了张敬焘恢复职务的“号外”。

消息迅速传开，各单位从上午开始，组织职工群众到市委门前和在全市各处游行，声讨“右派”学生。

橡胶六厂、台东医院、四方商业局、第三十中学等队伍，上午打着“热烈地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最亲切慰问张敬焘同志”、“严惩青医一小撮右派分子”等标语，首先冲入青岛医学院，随后涌入的职工队伍越来越多，在大街上、院中和大楼内捉拿“右派”学生，与青医和外地赴青的大学生激烈冲突，上百人被打，搜走存放在保卫科的子弹、土枪。市委得知职工与大学生又发生冲突，派人通知职工队伍撤出医学院，但效果不佳。

位于抚顺路的冶金学校造反红卫兵，8 月 31 日扣押市教育党委书记。9 月 1 日上午，7000 多名职工包围学校要揪“右派学生”，教育党委派人接出书记。

一些单位开始查找 29 日夜间第二体育场大会侮辱张敬焘的“罪魁祸首”，很快知道，一位残疾退伍军人发言后，张敬焘被打被斗，但不知道这位退伍军人的单位和姓名。经过进一步回忆查找，得知发言中曾提到是纺织工人，退伍军人，26 日至 28 日在青医附院住院，印发过七位病员的“公开信”等等。找到那份传单，核对上面签名人，查不到何典的有关信息，于世军没有签名。但“公开信”第一个签名的孙相银是国棉六厂工人，26 日至 28 日在青医附院住院，关键孙相银签字后在名字后面写了“（残废军人）”。孙相银不是“残废”，当年从军队退伍时，为了争“待遇”，找借口办了“残废军人”的证明。他的这些信息和于世军、何典 29 日发言讲话中的信息巧合。没有参加 8 月 29 日批斗张敬焘大会的孙相银，被认定在大会上殴打了张敬焘。

9 月 1 日上午，孙相银离开青医附院回单位办事，在大街上发现张贴着声讨“殴打张敬焘的罪魁祸首孙相银”，“打倒反革命分子孙相银”等大标语，他一头雾水。回到单位，立刻被扣押，让他交代殴打张敬焘的罪行。孙根本不承认，说明没有参加 29 日的大会，何来“殴打”一说？但孙在厂内不守纪律，在厂外曾因纠纷被送到派出所处理过，所以人们不相信他的辩解，仍然开会批斗他。这也是后来孙相银积极造反的原因之一，他成为青岛著名造反武斗组织“八一兵团”的主要负责人。

还有一位建筑工人，平时有些吊儿郎当。8 月 29 日大会结束，他把给张敬焘挂的牌子拿回家，第二天带到单位，举着牌子到处吹嘘他如何参加了批斗会。

9月1日被建筑公司揪了出来，虽然他一再交代那是吹牛，但还是被押着跪在台上也挨了批斗。

各单位张贴批判“右派”学生的大字报，全市参加游行的人数约15万。此即“青岛9·1事件”，被造反派大学生定为“反革命事件”。

北海舰队卢仁灿9月1日上午刚到办公室，听说恢复张敬焄职务的消息，他乘车来到荣成路谭启龙住处，谭不在，工作人员告知他并没有恢复张的职务。

9月1日14时左右，省委工作组郑子久到青岛医学院，要他们派代表参加协商会议。面对包围医学院声讨“右派”学生的队伍，青医文革临时领导小组一把手管姓大学生回答：“围攻不解除我们绝不参加这样的会议。”原定的协商会只得推迟。

海洋学院9月1日下午也被包围，其中大部分是郊区人民公社的社员，鱼山路、大学路、红岛路的三个校门被堵得水泄不通。职工和社员从第一和第五校门（第三、四校门长期封堵）冲入学校，到处抓“右派学生”，引发冲突。

9月1日约16时，谭启龙身穿军装乘坐汽车，先后到黄台路青医门前、大学路海院第二校门附近等地发表辟谣讲话，否定恢复张敬焄职务的传言。他在龙山路职工群众聚集地区大声宣布：同志们：我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委谭启龙，今天在我的车上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苏毅然，还有人民解放军驻青部队负责人。我要向大家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按“十六条”办事，有不同意见可以摆事实，不要互相围攻。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要爱护国家财产。除了公安机关以外，不准扣人抓人。有人说对张敬焄处分的决定改变了，这是谣言，说主席来电也是谣言。同志们，希望你们不要到学校里围攻学生，这是不好的。

职工、社员的队伍逐渐从各大学周围撤退了。

但是，9月1日晚至9月2日凌晨，市委和人民会堂周围仍有职工群众请愿静坐，要求撤销对张敬焄的处分。

周恩来9月1日到毛泽东处，报告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中央办公厅陈文会（音）9月2日0时45分给青岛打电话：“青岛市广大革命职工给中央来的三个急电和三个长途电话都知道了，我们都一一向党中央做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了。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中央要你们不要着急，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中央对你们参加大会的同志们健康非常关心，叫大家好好保重。”

北京清华、人大、科技大等大专院校赴青红卫兵深夜到市委上访，要求市委保证外地和本地师生的人身安全等。9月2日1时50分李克出面答复：今天市

长下了命令，任何人都有旅行自由，不能限制，邮电通讯有自由，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产生问题主要在市委领导。我们有责任确保同学们的安全。

市委9月2日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对张敬焄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但2、3两日，青岛仍在混乱当中。全国各地到青岛的几十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展开调查，形成两派意见。有支持市委，谴责“三大院校”学生首先打人的一派；也有支持“三大院校”，谴责市委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一派，一时众说纷纭。

陶铸9月3日给谭启龙打电话：犯方向路线错误还是内部问题，不是反革命。陶的讲话是针对张敬焄的，明确表态张“是内部问题，不是反革命”。

按照周恩来9月1日和陶铸9月3日的指示，谭启龙在3日向中央呈送解决青岛问题的报告，提出召开职工和大学学生的协商会议。

9月4日，经陶铸批准，中央发出《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

青岛市委、谭启龙同志、山东省委并告华东局：

一、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同志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

二、对学生和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三、工人与学生发生的问题，可采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

此电文可在工人与学生中公布。

中央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按照中央的指示、电报，谭启龙筹备召开职工与大学学生的对话协商会议。

## 七、王效禹“跳出来了”

王效禹，档案出生时间1914年2月，出生地原籍山东益都县亲仁乡西北约段村（现为青州市高柳镇段村），该村分为南、北两个村，王是北段村，他早年干过织布工人。

1938年初，中共益北特支书记王宗东到段村开展抗日活动，6月发展王效禹等人入党，入党不久任中共益都七区段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家乡约百人参加革命队伍，投身抗日战场，接着升任七区区委书记。1938年12月调任益都县委组织部长，1939年8月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12月任临淄县委书记，1941年5月兼任临淄独立营政委，同年12月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

（也称清中军分区）副政委兼团政委。

1945年春末，王效禹任博兴县委书记，县委机关驻陈户。5月，日本鬼子指挥官下川纠集2000多日伪军包围陈户，王效禹指挥机关和部队分头突围。他这一路约200多人向东北方冲去，第一次冲击被优势的日伪军挡了回来。随后开始第二次突围，经反复冲杀，王效禹等36人突出重围。其他各路相继冲出。此战八路和群众伤亡约500人，100多名群众被抓。

抗战胜利后，王效禹历任清河地委中心县委书记兼15团政委，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等职务。渤海区成立后，关锋由冀鲁边区合并而来，1944年任渤海区教育科长。王力1947年先后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团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王效禹这时期与王力、关锋逐渐熟悉。

康生1947年11月到渤海区搞土改，依旧是极左的那套政策，与区党委负责人景晓村等人意见分歧。王效禹同王力、关锋等人基本一致，支持康生。

1949年3月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王效禹1950年3月调任山东分局检查处长，1954年4月，升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

1957年“反右”运动，与王效禹关系不错的省检察院刘佩侠，刘新民、米兴运、潘德明等人成为目标，准备打成“右派”。王效禹当时正在青岛休养，急忙赶回济南，提出反对意见。他拒绝参加检察院的“反右”领导小组，并对机关党支部姜书记说：“我看我们机关没有一个右派分子”，要求对受批判的人按内部问题处理。核实定案阶段，王效禹负责查对材料，在他的干预下，除了刘新民被定为“极右”，行政工资级别降1级外，其他3人得以解脱。

刘新民在国内战争末期的动乱年代中，是流亡江南的学生。1957年写了篇《小小争鸣》的文章，没有发表，在检查时主动交出。王效禹对此批示：“为了检查思想，主动交出，不算攻击。”可检察院认为刘新民的言论与人民大学著名大右派葛佩琦遥相呼应，又批判他1948年随国军流亡，刘根本不服，申辩反驳，因此定为“极右”。

1958年春天开始的山东省“整风补课”，王效禹被打成“右倾”，他所保的4个人重新被定性。刘佩侠定为“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米兴运定为“右派”，潘德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实行管制，刘新民升级为劳动教养。1959年给予王效禹留党查看处分，从10级降为13级，降职安排为德州棉纺厂副厂长。

60年代，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决定对一些右派的问题予以甄别，因为王效禹不承认“右倾”的“态度”问题，开始几批没有他。时任省检察院检察长的王华提出甄别刘佩侠，给王效禹找到甄别的理由。1964年10月王路宾、王效禹参加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到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工作组。社教团长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历波也在那里搞四清，文革中成



为王效禹大秘书的王崇训是工作组的笔杆子。1965年1月王效禹等人得到甄别。

1965年6月5日，青岛市人大五届五次次会议按上级安排补选王效禹为青岛市副市长。10月3日，山东省崂山县“四清”工作团正式宣布成立，驻县委所在地李村。团长杨岩（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团长周化南、许剑波（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王效禹。杨岩是挂名的，实际负责人周化南，以后又增补山东省军区一名政治部副主任和北海舰队快艇一支队政委张慕水两名正师职军人任副团长。

1966年7月8日，崂山县3600多名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在李村，进行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四清运动，分为中学部和小学部。教师集训团成立临时党委，王效禹任党委书记。

文革开始后，曾是“右倾”的王效禹比较紧张，他不想再“右”了，“8·18”之后积极参与“破四旧”运动。据1967年7月1日出版的第18号《青岛怒涛》报第二版刊登《谭启龙、张敬焄之流迫害王效禹同志罪责难逃》一文记载：“去年八月份，农村‘破四旧，立四新’，王效禹同志在崂山县中韩公社西韩大队亲自带领红卫兵去搜四类分子的家，搜出了变天账，反动日记”。“王效禹同志还和红卫兵一起铲除了改良主义保皇党康有为的坟墓”。1966年8月周化南批他：“领导干部带头这样搞影响不好”。对于王效禹参与“铲除”康有为墓地一事，笔者曾调查多人，无法证实。

位于崂山的青岛第四十一中学（改名工农中学）教师李守丰8月30日上午到市区办事，看到大学生在太平路批判张敬焄，又听说29日夜召开了批斗大会。晚上回到李村，他找到四十一中多名教师商议，由教师张鸿瑞起草一份《四十一中呼吁书》，李守丰、张鸿瑞等10名教师签名。“呼吁书”，认为崂山县教师“集训班党委是想用种种借口把我们死死关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到底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教师们提出“查清事实真相，彻底清算集训班党委的错误”，表示“学习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打倒一切保皇派”。

“呼吁书”的情况，30日晚上崂山工作团就知道了，周化南电话与在市区的许剑波商议对策，许和省委工作组郑子久研究后答复：只是一般地表示支持，不能全面肯定。周化南、张慕水、王效禹等人连夜开会，周与王的意见不一致。周化南单独对张慕水谈了对王效禹的看法，他回到市里汇报，张慕水留在李村。

8月31日上午，李守丰等人继续赶往市区各大学串连取经，专门前往青岛医学院，在院子中大声宣布要和革命学生站在一起。受到鼓舞的青医师生，准备第二天派大学生到崂山县委驻地李村开大会。当时笔者的家住在黄台路，在医学院内看热闹，就在现场，听了李守丰的讲话。

留在李村的四十一中教师张鸿瑞等人，联合其他学校教师，31日上午敲锣

打鼓到崂山县人委送“呼吁书”。教师集训团临时党委书记王效禹出面接待，接了大字报，讲话中表示，欢迎给集训团党委提意见，支持教师的“革命行动”。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情况。据参与“青岛8·25事件”的两名大学生主要负责人在1969年“九大”后批判王效禹时联名发表的《剥开王效禹所谓“造反”的画皮看资产阶级政客的狼子野心》一文所说，1966年“八月三十一日晚上，王效禹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说：‘教师集训班中四十一中的教师到市里串联的回来了，明天市里的革命师生到李村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团党委执行的资反路线，支持集训班的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还要将四不清分子剃鬼头，游街示众。’王效禹误听为要剃他的头，游他的街，吓的汗流满面”等等。

31日晚约22时左右，王效禹来到李村北山的崂山党校中学部，到四十一中教师宿舍询问：“你们是写‘呼吁书’的中学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行动晚了，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动？我不要党籍了，冒着危险来搞革命，你们快串连吧。”四十一中教师立即召集各中学的11名文革小组长，到党校卫生室开会。王效禹在会上说：“我们要造反，化南已经跑了，他是保皇派，对红卫兵不支持，市委有问题，省委也有修正主义。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现在小将们都起来造反了，保证中国五十年不出修正主义。”

在青岛可以说王效禹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了省委，认为“省委也有修正主义”，理由是“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

王效禹为什么急于对四十一中教师表态？笔者分析在于四十一中教师的“呼吁书”和晚上的那个“剃鬼头”的电话，矛头对着教师集训团党委，他是党委书记。又得知张敬焘因大学生闹事被撤职，他担心再犯“右”的错误，重蹈张书记覆辙，所以急忙找四十一中教师表明态度，争取主动，成为市级领导中第一个公开支持大学生红卫兵的“左派”领导干部。

1966年8月31日，王效禹正式踏上3年“造反”之路。这一“反”，改变了他后半生近30年的命运。

张慕水8月31日22时多得知王效禹的表态，马上给市委打电话，许剑波接电话，张说：“王效禹跳出来了”，许和周化南向谭启龙、苏毅然汇报，卢仁灿等人在场。谭说：王效禹跳出来好嘛！你赶快回去。

周化南23时多赶到李村，午夜时分，派人找回王效禹，张慕水批评他，王不服，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

9月1日早晨，参加了王效禹表态会议的11个人分头传达王效禹讲话，准备给“四清”工作团党委写大字报，王效禹同这些人一起吃了早饭。

但是，恢复张敬焘职务的谣言9月1日上午迅速在市区传开，也传到了崂山县，支持大学生造反的王效禹、鞠维信等人慌忙作检查。周化南布置在崂山县人

委找了间房子，市委派驻工作团的项锡洲对王效禹说：组织上决定，叫你到县人委去休息。并安排工作团的4个队员看护。当夜，工作团给他家中打电话询问其夫人刘崇玉：王效禹是否有枪？刘回答：没有。

崂山县委驻地李村9月1日下午也开始集会，游行队伍举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效禹”的牌子。参与写“呼吁书”和开会的四十一中多名教师被列入“反革命集团”。李守丰等人9月2日被罚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低头交代作检查。

谭启龙9月1日下午发表辟谣讲话，市委9月2日公布张敬焄已经撤职。

9月2日上午，刘崇玉接到通知，下午赶到李村，得知王效禹被隔离，要求见面，被拒绝，她只好回到市区家中。当晚23时左右，刘崇玉给市人委打电话，对扣押王效禹表示不满。副市长王云九、郭士毅等人与她谈话。

9月3日王效禹知道恢复张敬焄的职务是传言时，很快来了精神，早晨他写信质问为什么对他采取这种措施，要求和家属见面。刘崇玉下午接到通知又来到李村，见到王效禹，按照王的布置，马上返回青岛，和女儿一起到中山路邮局，向中央发了第一封电报。当时她身上的钱不多，按照这些钱和王效禹的意思，拟定了简单的电报稿：

中央：

崂山县9月1日发生了严重地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案件。

王效禹发于禁闭室

紧接着，王效禹9月4日凌晨2时35分通过崂山邮电局向北京发出第二封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自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的严重的方向性的错误。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的口号是要热情欢迎，坚决支持，婉言谢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要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到过不同意见，作过争论，没解决。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此，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

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敬焘同志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的，打人是错误的，应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把事情搞的更为复杂。

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 发于禁闭室

九月四日二点

这封电报的抬头值得研究，估计王效禹经过反复考虑。第一封电报已经发给“中央”，第二封专门发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9月份全国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通过广播、报纸报道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的排名顺序，已经觉察中央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的声望如日中天，许多省市发向北京的电报和文件都把“毛主席”和“党中央”排在首位，有些还在“毛主席”的前面加上“最最敬爱”、“伟大”、“英明”等形容词。可王效禹却单独给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为什么？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当年与他关系密切，康生也知道他，估计这是主要原因。抬头只标“中央文革小组”而不写“中央”，就会保证这封电报能送到钓鱼台，不会送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王效禹在这些部门没有说了算的熟悉人。

有关资料中提到去邮局发第二封电报的具体过程有两说：一是王效禹自己到邮局发的；二是他委托一名学生去发的。笔者采访了很多，均表示不清楚。

9月4日11时，看管王效禹的4个人离去，20时周化南与王效禹谈话，9月5日王效禹回到市区沂水路8号家中。

## 八、“9·7事件”、毛泽东批示和中央文件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中院校的工作组先后撤出。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学生的造反热情空前高涨，造反、“破四旧”等带来的问题接踵而至，一些地区的党委、职工同学生的矛盾尖锐化。8月份，全国各地发生多起事件。西安发生“8·15事件”。长沙发生“8·19事件”，还有“哈尔滨8·16事件”、“合肥8·27事件”、“重庆8·28事件”、“福州8·29事件”等等。

青岛自9月2日以后，中央连续几次下达指示，经过谭启龙和省委工作组的努力，局势逐渐缓和下来。但是，在9月7日这天，突然又爆发了“9·7事件”。

原因在于市北区检察院、法院9月1日曾发布《紧急通令》，命令“三大院校”等大学生中的“一小撮”前去“投案自首”。随后几天，就造反大学生来说，形势“好转”，有些大学生翻出这份传单，要去质问检察院、法院，出这口气。在一些红卫兵的鼓动下，经过串连，9月7日早晨，“三大院校”和外地来青的

数千名红卫兵，到市北检察院和法院去“自首”，加上尾随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从青医到市北检察院、法院，沿途和周围的辽宁路、铁山路、长山路、包头路、甘肃路、恩县路、陵县路、广东路、宁波路、武定路、上海路等都是居民区，人口密集，7日这天上万人聚集，闹得不可开交，持续10多个小时。

省委工作组迅速向中央汇报，陶铸打电话要法院和检察院作检讨。

笔者认为，“青岛9·7事件”应该上报了毛泽东。谭启龙9月3日给中央的报告和王效禹9月4日的电报也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事件”和长沙、西安等地类似问题，在王效禹的电报上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泽东

九月七日

批示中第一个被点名的是青岛，并且指出：“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明确给“青岛8·25事件”定了性质。批示中的“这个副市长”就是王效禹。

周恩来9月8日召集中央碰头会议，贯彻领袖批示，并电话告知谭启龙。8日当天，谭启龙在青岛召开省委工作组和市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领袖批示时说：“王效禹的观点是正确的”，“毛主席只讲王效禹这一件事，至于王效禹这个人怎么样，是另外的事。”卢仁灿、陈继德等军队负责人也到会听取传达。谭派许剑波到王的家中予以安抚。

康生9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大学等师生代表的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专门谈到青岛问题：“青岛的同志们，你们从北京还可以看到一个经验，北京各学校的工作组镇压革命，在北大、师大、清华你们都可以看到。山东海洋学院的同志们，全国各地连续发生镇压革命师生的事件应当如何理解？这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上的反动的思潮。有工作组去可发生这件事，没有工作组去也可发生。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思潮，是社会存在的，看到兰州、哈尔滨、西安、青岛和其它地方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如果从阶级斗争，从文

化大革命是深入灵魂的阶级斗争去理解，是可以理解的”等等。毛泽东的用词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康生的用词升级为“镇压”。

毛泽东的批示，崂山县不知道，“四清”工作团9月8日还在向省、市委上报王效禹的材料，认为他“反党”。

9月11日，中央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委等转发了毛泽东“9·7批示”，转发文件中删去了“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这两句。中央同时作了4条具体规定：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源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该电报中央办公厅编号为中发[66]468号文件。

同一天，《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接到中央文件，谭启龙先向省市领导传达。9月17日，又在青岛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王效禹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老干部中的著名造反派。

但青岛很多基层职工群众不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文件，仍旧批判王效禹。省委工作组副组长朱本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公开说：“毛主席已经批了他的电报，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现在不能提他的意见，运动后期再说。”

## 九、职工与大学生的协商会议

根据周恩来、陶铸的指示，中央9月4日《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谭启龙4、5两天连续主持会议、研究召开协商会议。在青岛的3位省委书记大体分了工，谭启龙抓总并负责海洋学院和职工；苏毅然主要负责青岛医学院等大学生，栗再温负责化工学院和崂山县。

为了缓解大学生红卫兵的对立情绪，谭启龙布置省委秘书长于明9月4日上午到401医院找张敬焄商议，要张在医院向大学生作检讨。但北海舰队不同意红卫兵进入军队医院，遂改由医护人员陪伴，省委工作组安排在莱阳路3号会见红卫兵代表。海军医生介绍张的病情伤情时，青医大学生要在现场录音，医生答复：这里不是青医的审讯室，不能录音。

许剑波陪同栗再温9月4日到李村，召开崂山县农民代表会议。

9月6日，发出《谭启龙同志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信》，约4000字，分6部分：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二、前一个时期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三、八月二十五日以来发生的事件的性质；四、青岛市委张敬焄同志所犯的错误；五、解决目前工人和学生之间纠纷的方针；六、当前我们应当采取的一些必要的措施。

“公开信”提出分两步解决青岛问题的方案：第一步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第二步再解决青岛市委领导的问题，并建议召开工农、师生、干部各方面的代表协商会议。

市委9月6日在岳阳路10号召开扩大会，研究协商会议等问题。周化南在会上说明，9月1日“不是我们把王效禹看起来，是他自己提出要找一個僻静的地方休息，我们考虑到他神经不太正常，怕出问题，所以采取了保护措施，找两个人去照顾他”。周还说：“9·1”自发大会消息传到崂山县时，王效禹躺在床上不起来，并自言自语地说“我犯了错误，我是右派，是反革命，叫公安局把我抓起来吧”。

同一天，市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

这期间，“三大院校”大学生开始接触“造反”的王副市长，海院4名红卫兵9月6日在沂水路11号市人委接待室采访王效禹、刘崇玉等人，了解9月1日至4日王效禹的情况。刘崇玉说她9月3日从李村回来，向中央发电的原文是：“最最最最强烈地抗议崂山四清工作团非法扣留王效禹同志；王效禹同志犯了什么错误，这种做法违背了十六条；要求党中央保证王效禹同志的人身安全；要求党中央快来吧……”9月7日大学生继续在人委大楼办公室采访王效禹，学生问：周化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效禹回答：要说我是个反革命，他才是个现行反革命哩。他还说：我根本不是右派，58年党内重点补课，被斗7、8个月。处

分是留党察看，行政降3级，下放劳动。64年华东局通知，王效禹没有错误，给予平反。学生们又问：大字报揭发你听说张敬焘戴高帽，你大快人心，拍手叫好，是真的吗？王效禹回答：是真的，我大快人心，拍手叫好。天下形势大好，他应该撤职，应该戴高帽子。9月6日至9日，王效禹连续4天接待大学生红卫兵来访，点名批判张敬焘、周化南等人，认为“三大院校”造反大学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突然爆发的“9·7事件”使谭启龙注意到，8月30日到青岛后，处处受到青岛和外地大学生的掣肘，处于被动状态。“三大院校”当时没有成立全市性的组织，但他们互相联络。开始筹备协商会议了，7日大学生再次聚集到市北检察院等地，统一行动，中央再次来电话。省市委方面没有与红卫兵联系的专门组织。

9月8日，谭启龙在人民会堂3楼会议室与中等学校的上百名红卫兵代表座谈，同时宣布成立红卫兵联络站，加强市委与红卫兵的沟通，在座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郑干任站长，副市长于波、未回部队的北舰正师职军人独庆夫等任副站长。

参加座谈会的一中高、二中高、十一中高、十三中初三、十五中高、十七中初三、二十五中初三、三十九中高、二十中等学生代表，在现场商议，提出成立全市性统一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得到谭启龙的支持。虽然8月21日四方机厂技校等11所中等学校已经成立“红卫兵总部”，但人数少，没号召力。经过几天的筹备，9月13日起草了中等学校的《青岛红卫兵第一总部宣言（草案）》，9月15日通过。参加9月8日座谈会并提议成立“第一总部”的几位中学生代表任总部常委，三十九中一名高中生任总指挥。“第一总部”坚定地站在省市委一边，与王效禹为代表的造反组织针锋相对。

9月16日，原有的“青岛红卫兵总部”分为两个组织。其中原有职工发起成立“青岛市职工红卫兵总指挥部”，办公地点在上海路6号工人文化宫内，成员要求40岁以下，负责人是青岛化工厂的夏乃建。另外商校、技校等中专学校成立了“青岛红卫兵纵队”，办公地点在浙江路11号天主教堂内，商校等学生负责。这两个组织与“第一总部”观点相同，支持省市委。

9月8日这天，第九中学造反派教师王常发和少数学生，联络十五中、十七中、三十九中等的学生组织，成立“青岛市中等学校革命造反团”，这是青岛首个全市性的造反组织。

海洋学院9月8日开会，辩论谭启龙9月6日的“公开信”，通知谭去参加。但8日这天太忙了，他与海院学生约定明天再去。

“三大院校”和外地赴青学生9月9日在海洋学院召开大会，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到会。谭在会上讲话：“我的公开信，对革命师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



行动，始终是坚决支持的，我们的立场一直是明确的。”“工农同志们还向我提出了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就是青岛市委是青岛市百万人民的市委，张敬焄同志是市委第一书记，要打倒青岛市委，改组青岛市委，要定张敬焄同志的错误性质，他们有没有发言权？”“我们热诚地希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团结起来，按照‘十六条’的要求和中央的指示，把斗争目标集中到一斗、二批、三改上来。”

青医 9 月 10 日 15 时 30 分在工人文化宫主持召开“关于张敬焄问题辩论大会”，约 3000 人参加。哈工大赴青红卫兵、崂山县、卫校、团市委、青医、海院等 10 多名代表发言批判张敬焄。

全市工交、商业等系统选出了职工代表，开了几次会，职工们对大学生批斗张敬焄，以及打人的行为意见很大。

谭启龙 9 月 11 日连续参加 17 级以上干部会和市工人代表会。在工人代表会上说：“张敬焄同志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害怕群众，怕得要死，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压制学生运动，犯了方向性的、路线性的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样一批革命小将首先冲锋陷阵，是打不开局面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自愧不如！我们的老框框太多了，我们受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太重了。你们青岛市，正是由这批小将们、红卫兵们一冲击，冲得我们许多组织包括市委在内，暴露出害怕革命，害怕学生运动的原形。他们干的好！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感谢！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错误，更不是这些缺点、错误不要纠正与克服。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些缺点、错误，怎样纠正这些缺点、错误”。“贯彻中央指示的关键，在于大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经过最近几天的工作，双方的思想已经逐步接近”。

省委工作组成员也找各学校的师生员工做工作。青医一些干部、部分一、二年级的学生，对一些高年级造反派的言行有不同意见，省监委副书记宫云潘等人 9 月 12 日在莱阳路 3 号与这些人谈话。

王效禹 9 月 13 日上午致信谭启龙，对解决青岛问题提了 4 条建议：

一、“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如何，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在这个前提下，纠正其缺点，并不困难。

二、一切阻碍这个运动，破坏这个运动，污蔑这个运动的言论和行动，都是违背“十六条”的，必须加以反对，加以教育纠正。

三、对革命师生队伍不纯的问题，要用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论述的观点、立场去解决。相信绝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少年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敬焄同志所犯错误的根本思想就在这里弄错了，对革

命师生采取了对立态度。“九·一”事件我认为是个反动事件，是敬焘同志错误的继续，后果很坏，已扩大到农村，这里直接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四、要说服群众，首先要说服领导。

山东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复旦大学、山东师范等外地赴青大专院校的数十名红卫兵，9月13日宣布成立“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负责人有山大王世歧，北京化院的红卫兵。该组织以后在配合王效禹实施的造反和夺权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省委工作组多次与青医、海院、化院等大学“指挥部”、“文革会”的负责人谈话，经过几天的连续工作，这些人和部分大学生态度转变，表示可以配合省委工作组。

9月15日，谭启龙主持召开市委常委和省委工作组联席会议，分析青岛形势。谭认为形势好转了，对立情绪已消除或基本消除。但也提出：要看到当前还有一股暗流。

为了继续缓和职工与大学生的矛盾，开好协商会议，经省委工作组协调安排，海院红卫兵分赴68个工厂企业送“团结信”，到印染厂时，受到上千名职工欢迎。9月17日，市纺织、铁路、财贸等单位职工到海院、青医、化院送贺信、倡议书，慰问学生，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

但是，部分受冲击曾挨打的青岛和外地大学生，仍然坚持原有观点。青岛医学院文化革命办公室9月13日编印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关于青岛事件真相》的长篇材料，内有20多张青医学生被打被斗的现场照片。9月16日青医又印发《对青岛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意见和态度》，仍旧认为张敬焘是“反革命头子”，“‘八·二五’、‘九·一’是两次极端疯狂，极其罕见，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9月16日，青岛建筑公司、百货批发站、四方机车厂等单位的职工，认为山大物理系大学生9月2日的《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是实事求是的大字报”，“希望火速翻印，它说出百万工人农民的心里话”。为了配合协商会议造舆论，山大物理系的学生按照毛泽东“9·7批示”等文件精神，17日对报告进一步修改补充，增加了张敬焘“确实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等内容。市委立即安排青岛印刷厂赶印20多万份，用了大约7吨纸。印制完毕，又被要求加印2万多份。到青岛、济南、北京等地散发。

职工参加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9月16日发表《给全市职工倡议书》，要求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三项指示”。

省委工作组和市委常委9月17日在文登路6号召开联席会议，谭启龙、栗再温讲话。谭启龙又到人民会堂召开的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同时，在省委

工作组的主持下，12名职工代表与“三大院校”9名大学生召开预备会议，研究制定协商会议的议程，起草有关文件，因意见分歧，起草的第一稿作废。

市委9月18日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张敬焄在协商会议上的检讨。谭启龙说：“向群众检查之前，先讲给我们听听。”张发言之后，大家认为有些内容和检查的程度不好把握，决定不在会上检讨了。

职工与大学生代表9月18日商定，委托职工代表夏乃建，海院学生代表潘万洪、省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郑子久三人再次起草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经过争论、商议，基本达成一致，写出第二稿。

第二天，大学生代表讨论时，对第二稿不满意，3名学生代表和3名职工代表，再加郑子久，7人再次协商。学生坚持报告中必须加上张敬焄“害怕群众，怕的要死”，“三大院校的大学生……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第三稿。

郑子久9月19日到青医参加师生代表会议，委婉地批评大学生要求召开10万人大会的意见。与此同时，省委办公厅郑秘书9月20日到李村，搜集整理关于王效禹的材料，打印5份。

职工与大学生的协商会议9月20日8时30分在政协礼堂开幕。主席团成员21人，其中省市委谭启龙等6人，工人郝建秀和夏乃建等6人，贫下中农1人，海院2人，青医2人，化院2人，中学生1人，文教卫生系统1人。北舰卢仁灿，六十七军陈继德也在主席台上，但不算主席团成员。

谭启龙讲话中谈了4点意见：一、正确认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二、正确对待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关于青岛市委张敬焄同志所犯的错误；四、迅速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随后的分组讨论中，青医代表认为谭的报告是“折中主义”、“修正主义”、“是小脚女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随后，大学生在大厅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参加大会的工、农和干部代表“进行审查”。

原计划会议20日当天结束，由于大学生与职工的意见对立，争论到傍晚，全体代表吃晚饭后连夜继续讨论。9月21日凌晨1时，再次召开协商会大会。5个代表发言，职工代表夏乃建、王厚群，大学生潘姓代表发言主要讲“团结”。青医等大学生发言中坚持要把“主谋者揪出来”，“九月一日是反革命事件”，“谭启龙是消防队长”等等。

大会发言后，郑子久宣读19日协商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稿），念了一半，青医学生提出抗议：“我们不同意”，“不民主，要小组讨论”。

谭启龙在战争年代也可以说是一员战将，指挥过千军万马。但1966年8、9月份在青岛，面对上千名大学生红卫兵，他反复做工作，到了表决的关键时刻，仍有百名大学生代表反对。

谭启龙火气上来了，站起来到前台发问：“这是团结的大会？还是分裂的大会？”下面大多数代表回答：“团结的大会”。谭启龙宣布：“同意团结的留下，愿意分裂的可以退出会场。”大多数代表鼓掌，青医等院校约百名代表退出会场。

9月21日凌晨3时，对“报告”表决，1174名代表，同意938人，反对136人，100名军队代表不参与表决，反对者是“三大院校”的学生。

协商会议结束，省委工作组向中央上报会议情况。包括少部分大学生在内的约90%代表通过了“报告”，省委工作组认为：青岛市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已经得到解决。

退出会场的青医、海院、化院等院校红卫兵一起开会，“海院主义兵”首先提出，联合组建全市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得到其他学校的支持。9月21日，青岛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成立。几天后，办公地点定在中山路74号（原市工商联），由化工学院的学生在总部负责协调工作。

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等省委负责人，9月22日下午在文登路6号与“三大院校”的姜、潘、管、程、张、毛这6名大学生负责人座谈，学生对谭在21日凌晨协商会的讲话不满意。谭回答：“我认为那几句话把矛盾揭开，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矛盾到了一定程度，必须揭开，要么向左转，要么向右转，不能长期调和。”“张敬焄的错误，就已有的材料，只能定为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定为反革命很难。”“这次解决的只是工人和学生别打架，团结对敌。思想认识问题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事实上，工人对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的意见不大，主要是对你们青医意见大。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张敬焄，但你们有些做法不对，工人也有些做法不对，双方都有问题。你们当中有少数人有问题。有些人想翻案，翻不了！你们不了解他们的历史……”谭启龙最后这句话，针对的应该是王效禹。会后谭对青医管姓大学生说：“张敬焄犯错误还不是因为你青医。”

谭启龙等人22日还接见“第一总部”等中学生代表，发表讲话，批评大学生在“8·25事件”和“协商会议”的“错误”言行。

当天，省委工作组在永安剧院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9·7批示”的精神。

青医一、二年级部分对“造反”有异议的学生，9月23日成立了属于“保守派”的“红旗战斗队”，随后部分教职工成立“保守派”的“东风战斗队”。

9月23日夜间，谭启龙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宣布省委决定段毅担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同时还说：“段毅不公开出面，公开出面的还是李元荣代理第一书记”，“张敬焄撤了第一书记，没有撤省委常委，公开出面不好，可以在后面出主意”。会上军人常委卢仁灿提出：“青岛问题还很复杂，问题还没有解决，省委书记最好留一个在这里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等人9月24日返回济南。省委常委、原济南市委第一书记段毅留下任幕后的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公开的是市长兼代理市委第一书记李元荣，幕后顾问省委常委张敬焘。省委工作组副组长朱本正等人也留下，没有留省委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9月25日深夜23时在北京文化宫接见“首都三司”等大学生红卫兵主要负责人，讲话中提到：青岛一位副市长坚决不同意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谭启龙同志处理的很好嘛。

实际上，协商会并没有解决问题。毛泽东支持造反，中央文革康生、王力、关锋等人直接插手山东、青岛，支持王效禹，风暴即将来临。

## 十、“青岛8·25事件”的影响和历史定位

凭借“毛泽东9·7批示”，异军突起的王效禹突然“红”了起来。

按照中央9月5日中发[66]450号和9月7日中发[66]460号等关于组织师生到北京参观的文件，青岛选出2700多名代表，9月25日乘专列离青赴京。“8·25事件”表现突出的青医张姓大学生是代表，王效禹写了一封信，要他到京交给王力、关锋。张拿着信，心存疑惑地问：“信写得这么简单，王力、关锋会接见吗？”王效禹回答：我和王力、关锋很熟，我们十几年不见了。在山东党内斗争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又一致了。只要他们见到我的信，一定会接见你们的。王效禹此处所说的“在山东党内斗争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是指1947年11月和1948年在渤海区时，王力、关锋、王效禹都支持在土改中推行极左政策的康生，参与批判渤海区书记景晓村。

张同学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地址，到京后把王效禹的信贴上邮票，寄往中央文革。10月3日早晨，有人通知他不要外出，王力、关锋15时乘车来到山东赴京代表团驻地，了解有关情况。王、关两人谈到王效禹时表示：“我们十几年不见了，你们回去以后，一定代我们向王效禹同志问好。”交谈约4个小时，询问了“青岛8·25事件”等过程。从这时起，王效禹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熟人重新挂上钩。

海院张姓、赵姓等红卫兵，在刘崇玉直接参与下，按照王效禹提供的线索，9月上旬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大范围的调查，先后到青岛、济南、德州、北京等地的省检察院、德州国棉一厂、中央党校等单位，采访40年代在渤海区工作过的负责人及50、60年代的一些知情者。依据这些材料，按照王效禹、刘崇玉的意见，11月份印发传单《为王效禹同志平反！彻底平反！！》

9月中旬以后，外地红卫兵继续到青岛串连，批判青岛市委和省委。东北工

学院两名大学生9月底到青岛，调查“8·25事件”，10月10日印发《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认为“谭启龙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

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出版，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10月4日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康生等人提议“要王效禹同志来”，山东省委谭启龙等三人10月8日到京后，康生通知他。谭提出反对意见，当天向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汇报王效禹的问题，同时给山东省委打电话要材料。

周恩来又与谭启龙谈话，王力10月8日电话通知王效禹，他离青赴京。中央工作会议10月9日开幕，山东原来只有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三人参加，增加了王效禹。

青岛市委已经明白王效禹得到中央肯定，10月8日立即上报省委“建议对周化南同志停职检查”。省委10月9日批示：“青岛市委并报华东局：十月八日电悉，同意对周化南同志停职检查。”

与此同时，10月8日省委向青岛传达谭启龙当天从北京发出的指示，市委秘书长李克连夜派汽车到李村接来原“四清”工作团的刘姓、项姓主要工作人员，起草关于王效禹的材料上报，省委整理了一份《关于王效禹同志的有关材料》，10月10日送到北京。

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会议发言，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启龙在10月17日代表白如冰、苏毅然的联合发言中作检讨：“在青岛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虽站出来做了不少工作，但仍然表现了‘怕’字当头，尤其是由于我们自己也处在被批判的地位，部分学生和群众不信任我们，加之青岛是沿海重要港口，我们思想上特别怕在这里出事。”

中央工作会议10月28日结束，王效禹回到青岛，成为大、中学生和职工造反派的领军人物。

保守派的青岛卫校、市立医院（工农兵医院）、红卫兵纵队等单位和组织一起赴京串连，10月15日前往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上访，汇报青岛“8·25”、“8·29”、“9·1”等事件，接待人员林江询问：8月25日、8月26日宣传“十六条”，有没有不好行为？扣人、押起来？青岛人员回答：没有。林江当场说：这是革命的行动。“9·1事件”不能说是反革命事件，没有事实。回到青岛，保守派大量翻印林江的讲话，王效禹迅速上报北京。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穆欣11月10日接见山东、青岛等地赴京红卫兵代表，王力表态：林江同志的讲话，有许多是错误，有人大量印发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林江同志，他正在检查。要他去青岛，是不必要的，他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他的检讨可以交给你们。你们要批判那个利用这个讲话的人，要同他们斗争。

仿照北京 10 月份筹备“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由“山大主义兵”和“山师串连兵”等著名造反组织组成的“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准备举办“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会”。北京的“展览会”1966 年没办成，济南的“展览会”10 月 20 日开幕，其中有“青岛事件”等专题展室，青医男女大学生担任讲解员。

“青岛大中学校总部”10 月 27 日印发 47 页约 5 万字的长篇材料《重炮猛轰谭启龙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门批判他到青岛处理“8·25 事件”的“错误”问题。

省委 11 月 3 日在济南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青岛李元荣、张敬焄、王效禹、鞠维信等人参加。济南红卫兵当天冲击会议。王效禹、鞠维信 11 月 7 日分别在会上发言，批判谭启龙、张敬焄在“青岛 8·25 事件”中的问题。

“山大主义兵”等造反派 11 月 5 日把谭启龙揪到北京。王力、穆欣 11 月 10 日接见山东红卫兵代表时，王力询问“青岛 8·25 事件”中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革命同志”，是否认真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在场的青岛学生回答：没有。

11 月 13 日，在国家经委礼堂召开大会，山东大学一学生、海洋学院一学生，青岛一职工主持。谭启龙检讨中谈到处理“青岛 8·25 事件”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场的山东、青岛造反派认为谭的检查不深刻，与他辩论，提出明天（14 日）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批判游斗谭启龙。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1997 年 5 月第一版）第 89 页记载：周恩来 1966 年“11 月上旬”就红卫兵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判谭启龙的十万人大会，并让谭游街一事批复：批斗谭的大会不能开，游街不能搞。”

笔者认为，这个“11 月上旬”不准确，应该是“11 月 13 日”或者“11 月中旬”。

对于 9 月份山大物理系赴青大学生的《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三大院校”等造反派印发大量批判传单。青医驻市立医院一名教师，9 月 26 日至 10 月 15 日，连续发表了“一驳”、“二驳”、“三驳”的文章。

“海院七一红造队”的红卫兵，10 月 11 日到济南山大找物理系赴青的李姓等学生辩论，宣传毛泽东的“9·7 批示”。

这份“调查报告”9 月份在北京散发，有一份经苏联大使馆到了莫斯科，10 月 22 日苏联《真理报》在第三版右上角以《青岛的事件》为题目，刊登摘要内容，翻译成中文是：“[塔斯社北京二十一日电] 现已获悉青岛流血事件的详情。从一些传单中得知，该城有一百四十名居民因反对‘文化革命闯将’的暴行，而

被‘红卫兵’们打伤。正如现在出现在北京的《青岛“八·二五”事件调查报告》这份传单所说”等等。山东大学有俄语专业，订有仅供小范围人员阅读的《真理报》，文革造反取消清规戒律，学生也可看了，但懂俄语的有限，没有发现“苏修”的这条“罪状”。直到11月中旬，一名俄语专业的大学生偶尔翻阅《真理报》，无意中看到这篇“反动文章”，“苏修”竟敢侮辱中国造反“红卫兵”。11月24日，“鲁大（注：1966年“破四旧”时，一些大学生把山东大学改名“鲁迅大学”，并在传单中署名“鲁大”。1967年山东大学造反派夺权后，王效禹批准的名称就是“山东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义兵赴青反修团”印发传单《最强烈抗议苏修〈真理报〉就“青岛事件”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批了“苏修”，再批保守派“山大红卫兵”，支持和参与起草“调查报告”的人员成了“苏修”在山东和青岛的卧底。

省委12月2日召开“全省革命师生、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在检讨中承认处理“青岛8·25事件”时“我们省委负有严重的领导责任，它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

“青岛大中学校总部”12月15日印发批判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与忠实执行者——谭启龙》。

按照济南“山红联”、“山大主义兵”的布置，谭启龙12月18日到青岛作检查。谭的到来，引发青岛反王效禹的“红卫兵第一总部”、“职工红卫兵总部”等保守派组织，与支持王效禹的“大中学校总部”、“八一兵团”、“工农造反军”等造反派，12月19日夜在王效禹的住宅沂水路8号附近冲突武斗。

谭启龙12月25日在青岛的大会上继续检讨“8·25事件”中所犯“错误”。

面对基本瘫痪的市委，谭启龙准备安排随他一起来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暂时负责青岛工作。但面对日趋紧张的局势，谭启龙于12月30日召开会议，提出由李元荣、王效禹、冯起、鞠维信、郑干、李克组成6人小组，维持青岛工作。

青岛造反组织“轻工分部”负责人宫树德、杨保华等，汇总海院红卫兵9月、11月采访王效禹记录稿《为王效禹同志平反！彻底平反！！》等多篇文章，于1967年元旦后编印成《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广为散发。

1967年1月15日，天寒地冻，快要下雪了，“青岛东方红”等造反派把谭启龙押到卡车上，在全市游街示众。对于这段经历，文革后谭启龙在回忆录《“青岛事件”与山东“文革”》中作了描述：“有一天，寒风凛冽，天空阴沉，造反派们把我强行架在一辆敞蓬汽车上进行游斗。汽车上放着一张桌子，4个红卫兵把我架在上面，把一块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启龙’的大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游斗从青岛市人民会堂出发，经中山路、市区，一直到崂山，然后再游回来。在汽车行进中，我被一根横过马路的电线勒住脖颈，倒在桌子上，差一点



造成窒息。”

谭启龙 1 月 16 日通过驻青部队，向毛泽东、中央、华东局发出在任的最后一封电报，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同时汇报在青岛的处境。但是没有回音。

康生、王力、关锋 1 月 19 日 23 时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青岛赴京的张汉祥、王世歧、张子石、孙枫丹 4 人，谈到“8·25 事件”那段时期，点名批判陶铸、谭启龙、苏毅然、周化南等人。

在毛泽东支持夺权的前提下，事先经过康生、王力、关锋的批准，王效禹策划组织了“青岛 1·22 夺权”，夺权大会发出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等文件中都有“‘八·二五’、‘九·一’反革命事件”这句话。这些文件，1 月 29 日晚上中央广播电台予以播发，《人民日报》1 月 30 日刊登。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 1 月 30 日通知青岛的王效禹赴济南，他带领张子石、孙枫丹、刘崇玉、彭世杰、王世歧、陈新茂等 22 人的青岛代表团，1 月 31 日中午乘火车离青赴省城，组织济南造反组织，在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支持下，2 月 3 日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王效禹坐上山东省的第一把交椅，掌权 2 年 3 个月。

“青岛 8·25 事件”是 20 世纪发生在青岛，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事件之一，是山东、青岛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谭启龙在回忆文章中提出：“山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

【史林一叶】

## 乱中夺权的青岛 1967 年 1 月

齐晋华

说明：本文节选自笔者 21 万多字的《一九六七年青岛文革日志》，略有修改，删去了一些人名和部分内容。

1 日（农历冬月廿一，星期日）

山东省省长白如冰清晨到青岛，准备与在青岛的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商谈有关山东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谭启龙 1966 年 12 月 18 日到青岛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被造反派扣在青岛）。

市南区委书记鞠维信、市教育局局长张子石（康生之子）等 34 人发表“元旦声明”，提出把市委秘书长李克从“六人小组”踢出去（1966 年 12 月下旬谭启龙与省委书记穆林等人商议，12 月 30 日在青岛宣布由市长兼代理市委第一书记

李元荣、副市长王效禹、山东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冯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郑干、鞠维信、李克 6 人组成领导小组，维持青岛工作)。“元旦声明”是 1966 年 12 月 31 日鞠维信和《青岛日报》社造反派共同起草的。

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简称“大中学校总部”)，发表《给全市革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提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组织由“三大院校”的青岛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青医主义兵”)、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海院主义兵”)、山东化工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化院主义兵”)发起，1966 年 9 月 21 日成立，化院杨云良在总部负责协调工作。由其主办的《红卫兵》报出版“新年特刊”。

受 1962 年“滕景禄事件”牵连的原青岛市委部分干部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准备赴京上访(滕景禄 1956 年 6 月至 1958 年 11 月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1962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跳楼去世)。

2 日

谭启龙、白如冰上午谈了 4 个小时，省委秘书长于明在座，主要谈山东工学院问题。谭启龙要求白如冰向工学院造反派大学生以及参与造反的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作检讨，谭、白约定晚上或 3 日继续谈话。但当晚白如冰不辞而别离开青岛返回济南，谭启龙立即给在济南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打电话。

一位市领导到市公安局 6 处，要求销毁“红卫兵联络站”编印的“工作动态”等资料，被拒绝(1966 年 9 月 8 日市委成立“联络站”，负责人副市长郑干、于波等人，“工作动态”被批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内容)。

“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简称“轻工分部”)，于 1 月 1 日印制长篇材料《王效禹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1 月 2 日加印封面(“轻工分部”1966 年 12 月成立，负责人新兴文化用品厂职工宫树德、明胶厂职工杨保华)。

市文化系统 1958 年被打成“右倾”的少数干部，商议准备成立“青岛市文化界革命职工干部造反团”。

青岛医学院保守组织“红旗”、“东风”、“东海”的成员，把 1966 年 6、7 月份在学院的工作组长、海军航 3 师副政委刘同善带到北京住进地质部小学，引发与辽宁、吉林等红卫兵冲突，青医大学生撤出地质部小学。

3 日

王效禹、鞠维信和市委两名常委在莱阳路 3 号开会，市南区委办公室主任记录。王效禹要求两名常委揭发省、市委的问题。市南区委办主任起草给中央的电报，批判揭发谭启龙。

北海舰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广西路 1 号)的部分造反军人干部，在大楼

内张贴大字报，开展“四大”。

海洋学院原文革临时指挥部（1966年8月27日成立）主要负责人（大学生）发表《声明》，批判谭启龙，承认“上了当”，宣布“我要造反”（1966年“8·25事件”时职工与“三大院校”红卫兵冲突，经谭启龙、苏毅然等做工作，当时该大学生改变观点支持省、市委）。

青岛纺织机械厂两派职工1966年12月28日冲突，一名“青纺东方红”人员被打伤。市公安局本日派出两名警察到厂拘留参与打架的“青纺东风战斗队”人员，遭到“东风”部分成员的阻拦围攻。

4日

谭启龙在青岛起草《我的一张大字报》，号召大家起来揭发省委，并且送往济南。谭下午给省委办公厅主任张子明打电话，要求接到大字报后立即印发。送走的还有批斗原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焄的照片和冯起的材料。

青岛市公安局造反联络部（“公安造联”）成立，负责人市局2处、1处的几位造反派。鞠维信代表王效禹以两人名义到会宣读贺信。同日公安局副局长刘旭生带三名警察继续到青纺机械厂抓打人者，“东风”扣押警察李萍、韩文波，晚上押着二人赴京告状。

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沧口分部（简称“革干沧口分部”）召开成立大会，负责人沧口区团委书记高尚俭。事先王效禹在1张白纸上签名，再由高尚俭等人填写内容，代表王效禹的“贺信”。会后游行。

青岛冶金学校两派组织因为查抄“黑材料”引发冲突，5名学生被关押到公安局的拘留所。

“外地学生造反团”翻印刘少奇女儿刘涛的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外地造反团”1966年9月13日成立，负责人山东大学中文系大学生王世歧，成员有北京化工学院、复旦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外地大专院校在青岛串连的大学生）。

5日

山东省委在济南正式印发谭启龙在青岛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青岛八一战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贴出大字报《谁敢盗用毛主席的名义，谁就是反革命》。批判该校长征战斗队翻印的传单《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写的第二张大字报》。

6日

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简称“革干总部”，负责人市外办鞠洪林）在人民会堂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鞠维信代表王效禹、冯起在会上发表“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市委1

名常委宣读“声明”，认为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但一些造反派不同意另1名常委署名，改由个人署名后正式印发《我的声明》。

驻青岛沙岭庄，执行师级权限的海军潜水艇士兵学校（简称“潜士校”）训练部观通教研室部分军人，成立全校第一个造反组织“星火造反队”。

7日

在北京串连的（驻青）海军政治学校“红四野”（简称“海政校红四野”，1966年12月30日在京成立），参与军委所在地“三座门”前静坐，状告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海政校执行军级权限，驻地湛山大路2号。

青岛塑料二厂造反派批斗市委一名常委。市人委“捍卫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印发传单《谭启龙是扑灭青岛文化大革命烈火的罪魁祸首》。

8日

张子明17时从济南给在青岛的谭启龙打电话汇报：济南“山大主义兵”等红卫兵要谭13年的讲话等文件。谭答复顶不住就给，并要张子明告诉苏毅然坚决依靠左派。“左派”指济南造反派“联络总站”等3个组织。

苏振华凌晨3时打电话要求“三座门”前静坐的“海政校红四野”等组织的人员返回海军大院。“红四野”在北京张贴“揪出苏振华”大标语，苏当晚接见“红四野”人员。同一天，在京串连的（驻青）海军潜水艇学校（简称“潜校”）部分学员和教职员成立海军潜水艇学校红色造反军（简称“潜校造反军”），负责人“二系”（航海系）几名学员。潜校执行师级权限，驻地青岛浮山所。同日潜士校60多个造反组织在青岛联合召开“誓将我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会后在四方等区游行。

9日

（驻青）省外贸学校红卫兵和省外贸局“革命造反团”一起，到省外贸机关与负责人（曾任外贸学校工作组组长）辩论，简称“省外贸1·9事件”，此辩论被省外贸造反派评价为打开了机关局面。

市南区造反组织在区委搜出1966年下半年区委整理的有关文革情况的材料，认定为“黑材料”。

10日

“大中学校总部”等8个造反组织联合封闭青岛日报社，组成《红电讯》编辑部，主要编辑为报社的造反派及《红卫兵》报编辑等人。此前《青岛日报》总编梁柯平已被批判，报社被造反派控制。

“革干总部”与市农办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印发传单《“八三一”的真相——省、市委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是怎样策划迫害王效禹同志的》。

“外地造反团”《反到底》报编辑部印发传单《惊涛骇浪学游泳 革命熔炉炼新人》，提出“夺权和罢官”。

市南区人委、党校部分干部，与“红旗军青岛纵队”负责人宫善华（邮电局干部）商议，成立“红旗军青岛纵队市南分队”，设在市南区团委。

11 日

青岛卫戍区（六十七军兼）按照中央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发出的电报通知，对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军管。

“大中学校总部”等 13 个造反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接管市广播电台。同日，青岛日报社革命职工《红电讯》编辑部主办的《红电讯》报创刊发行。铁道部四方机车厂“工学指挥部”到该厂《火车头报》夺权。

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群战斗队印发传单，批判 1 月 6 日“革干总部”召开的大会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大会”，指责大会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谭启龙和张敬焄，而是指向李克、李镇（市委宣传部长）等。

自来水公司下属三个车间、一个小组停工停产，市区供水受到严重影响。

12 日

《工学战报》创刊发行，共 8 版，青岛机车厂工学指挥部主编，刊登中央文革戚本禹等人的文章。

13 日

山东省革命职工联络总部青岛联络站、青岛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总部等 6 个造反组织发布《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公安局“由青岛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同志接管，主持日常事务，并上报中央和公安部批准”。

“轻工分部”、“青岛东方红”、“大中学校总部”印发传单《沿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暴风雨坚定不移的迎上去》，表态“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精神，支持 1 月 9 日上海 32 个造反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印发《郑重声明》，“揭露”“青纺东风战斗队”3 日和 4 日阻挠并扣押执行任务的警察。

14 日

“海政校红四野”等造反组织人员在北京唱着《国际歌》冲进国防部（中央军委），找全军文革解决问题。

1 名市南区人委干部因为市南区领导干部身份，主动退出“红旗军”组织，在市人委传达室交回袖章。

15 日

造反组织“青岛东方红”冒着寒风把谭启龙押到卡车上，在全市游街示众。该组织 1966 年 12 月 23 日成立，是青岛最大造反组织。负责人是青岛建筑五金

厂团支部一干部。

驻青海政校、潜校、潜士校等海军院校赴京造反组织成员，在北京参加“批判三反分子苏振华大会”。

“群众造反军”的“敢死队”队长（国棉二厂职工）带领上百人，查抄中山路1号市搬迁善后联合处理委员会。“造反军”由1966年8、9月被遣返又回青的人员，11月6日成立，原名“群众还乡造反团”，改名“平反造反团”，总部在龙江路4号，核心组设在齐东路3号。该组织11月底电话向王效禹汇报，王的夫人刘崇玉接电话表态支持。王效禹安排“敢死队”在东平路3号市红卫兵第2接待站食堂免费用餐。但要其改名，最后改为“群众造反军”。该组织参与1966年12月27日在北京接管山东省委驻京办事处的行动。

济南“山工总串连兵”一派原定1月15日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批判谭启龙、白如冰等省委负责人，另一派“山工联主义兵”通知青岛“海院主义兵”等组织扣住谭启龙不放（谭1966年12月18日到青岛作检查后未能脱身），济南“串连兵”此后两次到青岛欲揪谭回济，被青岛拒绝。

16日

鞠维信到沂水路8号王效禹家中商议派人赴京向康生请示“夺权”的确切消息。鞠、王“保镖”（木器一厂工人）俩人，约23时到湖南路10号张子石家中请他到沂水路8号，王、鞠、张三人在2楼连夜进行商议。同一天，青岛吕剧团造反组织“红旗”在单位宣布夺权。

谭启龙经驻青部队向毛泽东、中央、华东局发出在任的最后一封电报，汇报在青岛的处境，没有回音。

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李作鹏，指示秘书给北海舰队等各舰队负责人打电话，通报苏振华的问题。同一天晚上，海军院校在北京的造反组织，抄了苏振华的家，在门上贴上封条，“政校红四野”、潜士校“红色造反兵团”等参与。

“海院主义兵”在北京冲击国家海洋局领导机关，张贴大字报，批斗局长齐勇等人。

市南区造反组织批斗区委副书记。

17日

王效禹安排张子石、“青医东方红”主要负责人张汉祥（大学生）、“外地赴青造反团”主要负责人王世歧（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青岛疗养院党委副书记孙枫丹到首都向康生请示有关夺权事宜，4人乘坐火车离青赴京。

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冯起召集“主义兵”主要负责人大学生牛家骥、孙云等在福山路冯家开会，酝酿以“三院一校”（海院、青医、化学、冶校）为主，成立“青岛第三司令部”。

冯起、牛家骥等人晚上到王效禹家中，商议接管青岛党政权力的问题，王效禹准备以工厂企业和崂山造反组织为主夺权，冯起主张以海院等“三院一校”为核心，联合工厂继续造反批判走资派。双方意见分歧，不欢而散。

青岛人民会堂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谭启龙、张敬焘、省委工交部长郑子久、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周化南等人，“保皇派”原“职工红卫兵”负责人陪斗。

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第二材料组，在济南调查谭启龙 1962 年为山大负责人（50 年代任青岛市委书记）甄别右派的问题。受滕景禄问题牵连的原青岛市委、人委的部分人员参加会议。会后部分人员赴京，经首都三司向中央监委送交为滕景禄翻案的材料

北海舰队护校学员要求开展文化大革命，北海舰队拿出海军 1966 年 11 月 11 日护校不搞“五大”的文件，学员回校成立“红色反到底战斗兵团”。“潜校革命造反团”印发传单《苏振华是刘邓彭罗贺埋在海军的一颗定时炸弹》。

省外外贸畜产公司成立“青岛畜产公司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畜产红总”，一把手是畜产公司毛皮厂负责人，主要成员有畜产公司党委负责人等，该组织共 19 人。

“群众造反军”因 15 日查抄搬迁善后委员会，被其他群众组织砸毁，负责人被押到公安局。一负责人（女）提出有哺乳的孩子，当晚释放回家，“造反军”人员把她护送到鞠维信家（龙江路 36 号甲）。

在北京与“青医红旗”等冲突的辽宁、吉林等 11 名红卫兵到青岛，在青医发言批判“红旗”等组织。这些保守派组织已经解体。

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办《东方红》报第 5 期出版，刊登批判刘少奇、谭启龙等人文章。

18 日

张汉祥、张子石等 4 人到达北京，住在中央组织部中苑招待所，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取得联系。

《青岛日报》复刊（新 1 号），刊登报社编辑向王效禹约稿的文章《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王效禹到木器一厂鼓动向市委夺权，当晚住进交际处太平角一路 16 号别墅楼，此楼另一门牌号湛山二路 1 号。

北海舰队文工团“全无敌革命造反团”到主持北海舰队工作的第二政委卢仁灿家中（福山路 17 号）批判他。当晚“北海舰队护校红反”继续到舰队要求赴京炮轰海军党委，无人答复，他们自行赴京。同日“海院主义兵”到北海舰队要原崂山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驻莱阳路 8 号海军快艇 1 支队政委到崂山县检查错误。

受北京造反派到国务院各部委夺权的影响，部属企业四方机车厂的转向架车

间 5 个造反组织联合在车间夺权，成立“青岛机车厂转向架车间革命生产委员会”。

青岛市委组织部“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战斗队”、“红色尖兵革命造反团”、“淮海革命造反团”等 4 个组织，翻印中央组织部“延安革命造反联络站”编印的批判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状》。

19 日

王力 17 时到北京中苑招待所与张汉祥、王世歧、张子石、孙枫丹谈话，支持王效禹在青岛夺权，要求 4 人马上返回青岛。孙枫丹提出希望“康老”接见。王力回答：需要请示。随后，康生、王力、关锋 22 时 15 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汉祥、张子石等 4 人，康生发表长篇谈话，康生、王力、关锋共同表态支持王效禹在青岛夺权，王世歧负责记录。

王效禹、鞠维信等人晚上参加轻工局“轻工分部”29 个造反组织召开的夺权筹备会议。会上“轻工分部”负责人杨保华提出联合 6 个组织夺市委的权。王效禹表态支持，并要求“是否联络更多的革命造反组织一起搞”。

北京海军机关上午在院内召开大会批斗苏振华，青岛来的海政校、潜校、潜士校等院校造反组织参加大会。同一天，青岛海军院校造反派把卢仁灿押往北京批斗。

国棉九厂“全无敌”等造反组织夺权。粉末冶金厂“井冈山兵团总部”等造反组织接管全厂党政权力。

“海院主义兵”等与“青岛东方红”冲突武斗。同一天，“红旗军青岛纵队”总部被造反组织砸毁后解体。

20 日

张汉祥、张子石等 4 人凌晨回到招待所，王世歧执笔整理谈话记录，给王效禹打电话，通报康生等人谈话内容。

全市各单位造反派分别召开批判省、市委执行资反路线会议，张敬焄、周化南、市委书记陈友群、郑干、市委常委兼副市长侯季五等被批斗游街。

“轻工分部”下属 29 个造反组织召开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宣布在轻工局夺权，成立“青岛市轻工业革命造反接管委员会”。在轻工局的会上，杨保华提出夺青岛市委的权，王效禹参加大会表态支持。同一天，王效禹到手工工业管理局对造反组织“东方红”负责人（木器一厂科长）说：你们夺局里的权，我支持。

卫生系统和卫生学校造反派到市卫生党委和卫生局夺权，负责人是青岛医学院在市立医院放射线教研室的教师（“青医东方红”成员）。市交通局“东方红”与“联合会”两派冲突，互相封门。青岛船舶修理厂“捍卫军”等 6 个组织在厂



内联合夺权。冶金学校“无产阶级造反军”（“冶校造反军”）等联合发布《夺权通告》，成立“冶金公社筹备小组”。第一中学“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等6个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青岛一中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在校内夺权。

21日

王效禹、鞠维信10时在湛山二路2号（太平角一路14号）召开第一次夺权预备会。“轻工分部”杨保华和于景瑞、“青岛东方红”李洪旭（省外运车队）、“崂山东方红”李守丰（四十一中教师）、“大中学校总部”和“化院东方红”杨云良、“公安造联”公安二处一名干部、“青医东方红”王庆宝、“八一兵团”孙相银（国棉6厂）、“革干总部”鞠洪林、“外地造反团”北京化院和山师等大学生、“文艺造联”负责人等12个组织代表，王效禹临时秘书（41中教师）、青岛日报社造反派等到会。杨保华提议在青岛夺权，王效禹表态支持，决定夺权后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刻制图章。“大中总部”起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市人民书》、《第一号通令》。15时会议结束，分头进行准备工作。23时19个造反组织在原地召开第二次预备会，新增“三司联络站”曹智水、“山大反修团”代表等。王效禹晚上给青岛驻军领导打电话要求军队支持青岛造反组织准备实施的夺权，驻军负责人没有表态。孙相银下午到“海院主义兵”总部，再次协商在青岛共同夺权问题，冯起仍旧认为时机不成熟。

各单位继续游斗张敬焄、周化南、侯季五等人。同时，“山东外贸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召开大会，批判资反路线。“联总”是省外贸多数派造反组织，在中山路93号省外贸局，负责人是省外运车队汽车驾驶员江存福，成员有“外运红旗”、“轻工红造”、“化工燎原”、“纺织卫东”等，属“青岛东方红”。

四方机车厂“工学”等造反组织在厂内夺权，负责人是厂技术员姜永棠。市供电局、渔业公司、发电厂、自来水公司、国棉六厂、渔轮修造厂、生资站、五金站、新文化用品厂等企业的造反组织均在本单位宣布夺权。

市南区机关“赤球”等7个组织成立“反到底联络总部”（“市南反到底”），负责人是区人委一干部。

“青岛市革命职工造反军联络总部”（“职工造反军”）分裂，其中一派20时宣布夺权，开除主要负责人等4人。原主要负责人开介绍信准备参加青岛第二次夺权预备会，但夺权派不准他去参加会议。

《工学战报》第3期出版，发表“本报评论组”《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联合起来》等文章。

22日

“青岛东方红”、“轻工分部”、“大中学校总部”、“八一兵团”等约20个造反组织数万人在东方红（汇泉）广场集会。其中“职工造反军”、“职工造总”等

组织没有参加 21 日的夺权预备会议，不清楚是夺权大会。11 时大会正式开始，杨保华宣布在青岛夺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市造委”），没有参加预备会的“职工造总”上千人退出会场，引发冲突。夺权大会后举行游行。21 日出席夺权预备会的“三司联络站”退出，没有参加大会。

王效禹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他因为领导干部身份，没上主席台。

“海院主义兵”、“主力军”、“秋收师”、九中“红旗”等在海院集会，冯起讲话布置在青岛夺权。中午得知王效禹等人召开夺权大会，冯起决定以“海院主义兵敢死队”的名义发出第一号至第五号“通令”。一号通令：“我们认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根本不能代表青岛市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无权接管青岛市委和青岛市人委”。

青岛“八一兵团”驻京联络站张春声（青岛食品厂干部）、王兵（青岛铸造机械厂职工），潜校王金德等参加了外地赴京造反组织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集会，周恩来代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要“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张汉祥、王世歧、张子石、孙枫丹乘火车晚上从北京返回青岛。

青岛日报社再次被夺权，改《青岛日报》为市造委机关报。市交通局“东方红”、“春雷”等组织联合夺权。橡胶六厂、市百货商店、制钉厂、红卫金属制品厂、钢丝绳厂、橡胶制品厂等都被造反派夺权。

陈伯达在北京宣布“全红总”为“非法组织”，不承认江青接见过“全红总”。该组织在青岛有下属成员。

23 日

王效禹下午在湛山二路 2 号主持会议，研究市造委常委人选等问题，提议杨保华、张汉祥等 6 人任常委，王指定杨保华、张汉祥为常委召集人。参加会议的省外贸畜产公司党委负责人要求所在的“畜产红总”参与夺权，“邮电东方红”等 4 个组织也提出同样要求，王效禹同意。1 月 23 日，确定“22 夺权”的造反组织为 23 个。

六十七军收到济南军区转发的中央军委特急电报，应该是 23 日当天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发[67]27 号文件《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按照市造委《第一号通令》的规定，原市委、市人委等各级负责人必须前去报到。市委常委、北海舰队卢仁灿被海军驻青院校造反派揪到北京，没有去报到。市委常委、六十七军政委前往登记，负责登记的“轻工分部”于景瑞（轻工机械厂司机）等人向王效禹作了汇报，王效禹认为六十七军主动支持配合夺权，对六十七军有了好感。

“青医东方红”印发传单《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谈王效禹》。同

时“大中学校总部”作出《关于开除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决定》。同日，夺权派把占据市人委办公大楼的中学生造反组织“第一司令部”、“红卫兵卫戍司令部”等赶了出去。

凌晨1时30分，“海院主义兵”乘两辆卡车冲进印刷总厂，抢走王效禹等两人给全市人民一封信的底稿，把排好的版拆散。“海院主义兵”、“三十九中红旗”等组织冲进青岛日报社印刷厂排字车间，不准捡排有关“1·22夺权”的稿件。当天夜晚，反夺权派继续包围冲入报社印刷厂，与夺权派冲突。夺权派到广西路1号北海舰队司令部，要求海军派部队制止反夺权派冲击报社，潘焱答复应该去找卫戍区。

“三司联络站”3时印发《就“一·二二”大会的严正声明》，反对夺权，认为“是一个政治大阴谋”。

“海院主义兵”、“职工造总”、“市南反到底”等组织在人民会堂集会，成立“毛泽东主义公社”，与王效禹的夺权派对立。“海洋学院毛泽东时代造反军”印发反对夺权的传单《揭开“1·22”夺权大会的内幕》。

“革干沧口分部”在沧口区宣布夺权。手管局“东方红”夺权成立“青岛市第二轻工业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二轻造委”，负责人是木器一厂的干部。化工学院、青岛疗养院、粮食局、卷烟厂、电站、钢球厂、电线厂、电站阀门厂、农业机械厂、玛钢厂、美术社、文物商店等被夺权。车辆厂两派各自夺权成立两个权力机构。

被青医保守派“红旗”等组织押到北京的原学院工作组长刘同善等人，返回青岛。青医保守组织已解体。

24日

王效禹起草致王力电报交孙枫丹发出。上午按照王效禹布置在原市人委二楼会议室开会（王没参加），确定杨保华、“青岛东方红”张珂亮（省外贸车队司机）、杨云良、张汉祥、“化院东方红”高志宏（化院大学生）、孙相银、鞠洪林、李守丰、季铭玲（“公安造联”）共9人任首届市造委常委。会议服务人员为原市委办公室、组织部的造反派。

北海舰队、六十七军分别接到中央27号文件《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六十七军召开党委常委会议，决定支持“左派”王效禹领导的夺权，准备派军负责人到北海舰队，商议协调一起表态，支持王效禹和夺权。北海舰队党委随即按照中央“支左”文件精神成立“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由舰队副司令员易耀彩担任。

反夺权派与夺权派凌晨继续在青岛日报社印刷厂内冲突。六十七军兼任的青岛卫戍区派出一连部队，与孙相银指挥的“八一兵团”等一起把反夺权派赶出印

刷厂。《青岛日报》约 14 时“套红”印制完毕，刊登《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 正式接管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给毛主席的致敬电》、23 个造反组织的《告青岛全市人民书》、《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发表社论《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王效禹布置参与夺权的“工农造反军”负责人带领 400 多人保卫报社。但决定市造委常委人选时没有他们的名额，“工农造反军”愤而加入冯起的反夺权派。）

王世歧整理出 1 月 19 日《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三同志和我们的谈话》。牛奔东起草夺权过程文章《苍茫大地 我主沉浮》。“青医东方红”印发《奋起千钧棒 澄清万里埃》、《坚决打垮冯起的新反扑》等传单。

“海院主义兵”牛家骥等人召开“主力军”、“职工造总”、“市南反到底”、二中和九中“红旗”等全市 75 个造反组织会议，决定第二天到青岛日报社抗议刊登青岛夺权的报道。同一天，“海院主义兵敢死队”发布《第六号通令》，批判“政治扒手王效禹、鞠维信阴谋篡权”，点名批“八一兵团”、“青岛东方红”等挑起武斗。

市邮电局、省外贸食品公司、水泥厂、城阳化工厂等单位造反组织宣布夺权。

《东方红战报》出版“夺权专刊”。《反到底》报第 2 期出版，发表社论《这个权夺的好》。

济南两派造反组织“山工总、串连兵”和“山工联、主义兵”先后到省、市委夺权，引发冲突，两派武斗。支持“山工总”的省公安厅造反组织利用职权，关押对立面“山工联”负责人董金福（山东大学职工）等人。

25 日

六十七军派副政委到北海舰队，商议共同表态支持王效禹组织的“1·22 夺权”，北海舰队潘焱出面接待并表态不同意支持王效禹和夺权。六十七军下午派政治部副主任到市造委表态：六十七军支持青岛的夺权行动。

北海舰队机关部分军人早晨准备游行“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被潘焱制止，当晚潘家（福山路 6 号）被舰队造反派贴了封条。

王效禹派张汉祥、杨云良、高志宏找“海院主义兵”牛家骥、孙云，希望他们参加市造委，留了一个常委名额。但牛、孙拒绝。

市造委发布《第二号通令》，宣布取缔青岛“红旗军”组织。“红旗军”以退伍复员转业军人组成。

首都三司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赴青红卫兵、一司新北大北京公社赴青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印发《热烈祝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成立》等传单，表态支持王效禹组织的夺权，批判冯起等反夺权派。

“海院主义兵”、“主力军”、“三司联络站”等造反组织数百人，分两路分别

冲击青岛日报社编辑部和印刷厂。同一天，“海院主义兵敢死队”发布《第七号通令》，批判“青医东方红”“一小撮别有用心混蛋”。

市建筑公司、国棉七厂、红旗化工厂等单位造反组织在各自单位夺权。

由青岛医学院东方红公社、青岛印刷总厂革命造反总部主办的《云水怒》报“创刊号”出版发行。

26 日

“三司联络站”曹智水 13 时 35 分打电话向北京“首都三司参谋部”汇报青岛情况，“三司”要求曹“坚持斗争”，表示“第三司令部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随后“三司联络站”印发《严正声明》，清华“激浪冲天”、北师大“碧血红心”等赴青战斗队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夺权。反夺权派下午继续在海院集会，孙云讲话。

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造反组织，继续在市内多处地方冲突武斗。

“潜校造反军”等组织在校内夺权。同日，在北京的潜士校“一反到底战斗兵团”约 200 人联合其他组织在海军大院批判游斗分管潜艇工作的海军副参谋长和潜士校校长。

市总工会、4811 厂、仪器仪表公司、火柴厂、印刷总厂等单位夺权。重工局“东方红”等 38 个组织夺权后成立“重工造委”。市卫生系统 2000 多人集会庆祝 1 月 20 日夺权成功，宣读《告全市人民书》和《通令》。

《工学战报》第 4 期出版，刊登四方机车厂工学指挥部《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声明》，支持“1·22 夺权”。

27 日

关锋约 20 时从北京给王效禹家中打电话，王效禹接电话，张汉祥、高志宏等人在场。关锋说：已经通知第三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开支持你们。你应该公开出面，不要在后台。对反动组织，为首分子要镇压，对受蒙蔽的同志要争取。新华社要转播你们的消息，你们要把材料报到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约 22 时直接打电话给六十七军作战值班室，要求军领导接电话，传达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三点意见。副军长齐威要军党委秘书刘文代接电话，便于记录。三点意见是：青岛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六十七军要支持青岛的夺权斗争，可以派部队全副武装上街游行；直接将这些意见转告王效禹。李水清从家中（金口三路 2 号丙）回到军部（武定路 29 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军文革指示，决定当晚紧急约见王效禹。李水清又电话通知北海舰队潘焱，协商驻青陆、海两军 28 日共同武装游行支持夺权。当晚六十七军连夜派人派车去请王效禹，王效禹、张汉祥、张鸿瑞等人到达，六十七军负责人报告：奉军委命令，六十七军支持夺权，支持王效禹。当晚，反夺权派数百人冲击六十七

军军部，与六十七军接待的负责人争吵辩论。当得知全军文革表态支持王效禹和夺权，很快散去。

王力给首都三司打电话，要求支持王效禹在青岛组织的夺权。首都三司 20 时 15 分给三司驻青联络站发出加急电报，传达王力指示，要求“全力支持革命造反联合革命委员会夺市委的权”。

“海院主义兵”、“主力军”、“职工造总”、“工农造反军”等组织上午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准备实施反夺权，并向“中华全国红色革命造反联合会青岛分会”送去反夺权和批斗王效禹的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五天时间大造舆论；第二阶段五天组织 100 辆汽车揪出王效禹游街示众三天，再宣布重新夺权。

首都三司的清华、地院、师范学院、邮电学院、石油学院、农机学院等 9 所大学赴青战斗队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王效禹夺权。首都一司赴青造反兵团发表《严正声明》，支持“海院主义兵”，反对夺权。

孙相银指挥“八一兵团”晚上围攻反对王效禹夺权的 4808 厂“八一支队”，抓捕殴打 34 人。沧口造委、“革干沧口分部”打砸对立面组织“沧口普通兵”和区文化馆“红旗”、街道办“红卫军”等组织。首都三司北京外语学院红旗战斗队等组织印发传单，支持夺权。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在市内多处地方冲突武斗。

青岛的海军院校赴京造反派参加了海军开展“四大”单位和军事院校造反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批斗海军主要负责人大会。潜士校“红色造反联络总部”200 多人执行大会保卫任务。

“潜校造反军”召开大会成立“夺权委员会”，主要批斗学校政委赵宏博等人，校长于侠也挨批。北海舰队文工团“反到底”等军人造反组织，到舰队文革办公室查封两箱“黑材料”。

青岛商检局、省外贸畜产公司、市化工公司、建材公司、第九中学“红旗”等造反派，在本单位宣布夺权。

28 日

“大中学校总部”、“轻工分部”、“青岛东方红”等夺权派大规模上街游行，庆祝中央文革表态支持青岛夺权。游行中王效禹碰到“八一兵团”孙相银把抓捕的 4808 厂反对夺权的人员五花大绑，押在车上游街示众。王效禹回到家中马上打电话找孙相银，批评“八一兵团”光天化日之下的行为。被抓捕人员中有的遭毒打后致残。

六十七军、北海舰队出动部队。六十七军调动军直炮团、199 师炮团和 595 团、守备 19 师等部队 5000 多人，在汇泉广场集会后，携带枪支武器，多辆嘎斯 51 牌卡车拖着加农炮，在市区武装游行，支持王效禹和“1·22 夺权”。北海舰

队上万军人先武装游行，然后在舰队机关附近的人民会堂前集会。驻青陆、海两军表态“誓作革命派坚强后盾”。

市造委发布《第三号通令》，贯彻中发[67]16号文件，要求“抓革命，促生产”，“要节约闹革命”等。

“首都三司”零时致电“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及王效禹同志”：“支持你们夺青岛的权”。

凌晨3时，冯起、孙云等反夺权派分乘五辆汽车离青赴京上访反映情况。“海院主义兵”等造反组织开会，宣布在海洋学院夺权。同一天，“主义兵”中部分反对夺权的成员承认错误，表态支持“1·22夺权”。

按照王效禹布置，成立“青岛市财贸革命造反委员会”，负责人是“畜产红总”，市供销社的领导干部。

台东区两派对立组织因为夺权引发冲突武斗。港务局、建管局、城建局、人民银行、捕捞公司、木器一厂等单位造反组织夺权。渔业公司39个造反组织第二次到公司夺权，成立“青岛海洋渔业公司革命生产委员会”。

山东海洋学院中南海兵团（简称“海院中南海”）印发传单《揭穿海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治扒手的反动嘴脸》。因为“海院主义兵”拒绝参加“1·22夺权”，王效禹等人联络“海院中南海”参与夺权。

“革干市南分部”查封“市南反到底”等造反组织总部，引发冲突。“反到底”负责人被押到公安局。

济南“山工总”和“山工联”两派武斗。与“山工总”一派的省公安厅造反组织，单方面抓捕关押对立面“山工联”7人。

29日

新华社晚上播发青岛市23个造反组织接管市委、市人委，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消息，以及《人民日报》30日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等文章。《大众日报》一版套红刊登报道《青岛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 夺了市委市人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发表社论《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市造委在东方红和沧口广场分别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杨保华、王效禹、陈继德、易耀彩等人讲话。市造委发布《第一号紧急通告》，内容“不许武斗”。

全市各单位造反组织，先后到市造委报喜表决心，支持王效禹等人策划组织的“1·22夺权”。

六十七军以“驻青岛陆军全体指战员”的名义，给北京发出《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致敬电》，表态支持夺权。

“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等原反对夺权的北京大专院校驻青组织，0时联名印发传单《向中央文革请罪》，随后印发《向青岛市人民请罪》，表示“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一切革命行动”。

“职工造反军”负责人到王效禹家中，要求抓捕该组织另一派的5人。王效禹答复：可以抓，但不要抓的太多。

海军151疗养院部分军人医护人员开始张贴大字报，准备成立造反组织。

“青医东方红”在学院夺权。同一天，沧口造委、“革干沧口分部”批斗“沧口普通兵”负责人。

30日

北海舰队、六十七军分别接到1月28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同日，驻青陆、海军部队，全市各单位造反组织，继续在市内各区游行，到市造委报喜，支持“1·22夺权”。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和报道《青岛市革命造反派空前大联合，接管青岛市委市人委一切权力》，刊登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致敬电》等文章。《解放军报》及各地大报转载。

王力凌晨4时从北京给王效禹打电话询问青岛情况，要求“效禹同志要公开站出来干”，并通知他去济南（因济南两派造反派为夺权打内战，省会局势失控。造反派中没有“权威性”人物）。王效禹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发表《呼吁书》：“夺山东省委的权”。

鞠维信通知“公安造反联络部”的9人带7副手铐，随北海分局保卫科长和北海舰队人员到“东方红”号考察船上抓捕冯起、牛家骥等人，但这些人不在船上。冯起是日从北京致电青岛王效禹，表示支持“1·22夺权”。

青岛医学院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化肥厂、文体用品商店等单位造反派夺权。港务局另一派造反组织到局机关反夺权，两派冲突。台东造委在反修电影院召开庆祝夺权成功大会。省外贸轻工公司“轻工红造”在公司宣布夺权成立“生产管理委员会”。“省外贸联总”召集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夺权问题。“畜产红总”十多人批判省外贸局长刘方谷等人，同时串连“轻工红造”等其他组织也准备在省外贸夺权。

“革干市南分部”第二次查封“市南反到底”总部。市南区法院、检察院的造反组织批斗市南区副区长等人。

151疗养院组织批斗在此疗养的航3师一名飞行员，他到舰队反映情况，途中被追回关押，开始绝食。

《青岛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庆祝《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报道青岛夺权的消息。



《红卫兵》报第6号刊登支持“1·22夺权”等文章。《东方红》杂志第9号出版“有关夺权的资料专辑”。

31日

王力晚上在《人民日报》社谈《红旗》杂志社论时说：“刘格平、王效禹……他们比较早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受到刘邓路线的打击，有这样的干部，但还是少。主席的思想是要这些人参加这场大革命。”

王效禹率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中午乘火车离开青岛，成员有张子石、孙枫丹、刘崇玉、王世歧、牛奔东，“外地赴青造反团”的山东师范学院大学生刘颂东等几名大学生，轻工机修厂彭世杰，王效禹的警卫、市公安局四处民警陈新茂，青岛铁路分局沧口站王冠一，省外运车队汽车驾驶员张永良等22人，当晚约21时到达济南。济南军区接待，住在英雄山北的经十一路39号济南军区第5招待所。

新华社播发青岛市造委会1月29日召开的“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和驻青部队支持夺权的报道。

《青岛日报》出现严重“政治错误”：头版头条套红刊登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把“万寿无疆”错印成“无寿无疆”。报纸发到用户手中后才发现错误，全市统一回收报纸。下午发出重新印制的《青岛日报》。

北海舰队继续派出两架直升飞机，散发支持市造委和夺权的红绿色传单。

省外贸“畜产红总”、“轻工红造”等38人21时砸开机要室抢走图章，赴济向王效禹汇报，称“省外贸31夺权”，此派称“131派”（少数派）。青岛铁路分局、钢厂、内燃机厂、电表厂、塑料5厂等被夺权。

省公安厅造反组织在济南关押对立面“山工联”负责人董金福等人6天，“山工联、主义兵”等组织冲砸公安厅。王效禹21时刚到济南，济南军区负责人和省公安厅造反派花光隆前来请示，王表态：“头头捉起来再说，这里边定有坏人捣乱”。按照王的指示，济南卫戍区、省公安厅宣布“山工联”为反革命组织。军区调动部队，22时驱散近千名围攻省公安厅的造反派，抓捕70多人。

附件1

### 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革命的同志们：

当前我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是一片大好形势。广大革命群众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了解，他们的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革命学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出

现了崭新的局面。广大革命群众正在大造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省、市委内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者的反；有些过去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已经觉醒了，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但是，还有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又在耍新的阴谋，玩弄新的花招，以“造反派”的面目出现，干真保皇的勾当，企图混在革命队伍里，争权夺利，分化瓦解革命组织。因此，斗争仍然是极其尖锐复杂的。革命的同志们，务必提高警惕！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青岛市委已经瘫痪了，成了我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障碍。谭启龙成立的青岛市三级干部会议六人领导小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因此，我们向全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们提出以下建议：各革命造反组织互相协商，用民主方式产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领导机构，接管原青岛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的一切工作，以便更好地开展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否有（得）当，请大家考虑，如果同意，请与山东海洋学院冯起同志联系，共同研究商量。

（口号略）

王效禹 冯起 鞠维信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 附件 2

### 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三同志和我们的谈话（摘要）

1967年1月19日深夜……康生、王力、关锋……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谈话……

关锋同志说：“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说话的，把它归结为一点，就是夺权！”

康生同志说：“要夺权就要联合起来。你们那里联合的怎么样？听说谭启龙和张敬焘游了街。”关锋同志说：“你们的力量怎么样？”我们回答说：红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以后，形势一天比一天大好！只是在十二月中上旬有过第三次大反扑。康生同志问：“什么人搞的反扑？”我们回答说：还不是省市委搞的两个红卫兵总部！

关锋同志说：“那是谭启龙的红卫兵！”我们介绍说：第一总部提出了转移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

康生同志说：“都一样，你们那里工人组织怎么样？”我们把青岛的形势与上海比较了一下。

康生同志问：“有没有工人的联合组织？哪一派占主动？”我们介绍了青岛东方红等革命的情况。

康生同志很关心地问：“四方机厂怎么样？”我们回答：他们成立了工学指挥部，有一千多人。关锋同志接着说：“夺了权以后，要马上进工厂去。”我们把《青岛日报》、广播电台、公安局接管的情况大概地汇报了一下。

康老问：“谁夺的？出报不出报？还是监督好！”我们又详细地讲了广播电台接管的前前后后。

康老说：“学生接管了，解放军就可以回去了。没去的就可以不去了。”

关锋同志问：“王效禹怎么样？”我们把王效禹同志的情况谈了。并说：“效禹同志说请康老代问毛主席好！代问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好！”康生同志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我们表示说：我们有雄心壮志，不仅把青岛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把山东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康生同志点头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这时我们又介绍王效禹同志最近下厂的情况。

康生和王力同志一起说：“很好，那里是主要阵地！”我们又把王效禹同志家被围的情况说了一下。

王力、关锋同志一起说：“那证明王效禹同志很不错！”我们说：围攻时还拿着棍子和开水。

康老说：“哦。动武的！”这时我们才说出我们是来京汇报、请求指示的。康老说：“夺嘛！不要来了！”关锋同志说：“不要光看形势，红旗评论员文章，比两篇社论还重要！”康老说：“主要还是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接管。青岛的条件比较成熟。”关锋接着说：“经过三次大反复，他们都暴露出来了。”

康老又亲切地问：“你们青岛医学院怎么样？”我们介绍了“东风”和“红旗”的情况及其和省委的关系。

这时，王力同志又研究了《人民日报》的情况。（王力同志去报社）

我们又谈到王效禹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事。

康生和关锋同志一起说：“那是我们要他来的！”我们说：“最近才搜出黑材料”，并提到苏毅然的事。

康老问：“苏毅然是谁？”回答说：“省委书记处书记。”关锋同志说：“很坏！”康生同志说：“王效禹同志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关锋同志说：“周化南很坏，他扣王效禹，我就估计上面一定有指示的！”我们说：“谭启龙还搞六人小组。”并报了六人小组名单。关锋同志笑着说：“还搞合二而一啦！”

康老问：“这个六人小组，穆林没去？”我们把谭启龙封王效禹同志的官的

情况汇报了。

康老说：“都没干好！市长是谁？”我们回答说：“李元荣。”关锋说：“让他（王效禹）干市长也是想整他！”

康老问：“谭启龙住在市委吗？”回答说：“到处跑！”康生同志说：“你们找着他住在学校里就好了！”又问：“你们山大怎么样？在青岛有多少？”我们介绍了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的情况。这时，康老对山大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另发）。康老又问：“对两条路线你们了解的怎么样？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那里大字报有没有刘、邓的大字报？”我们作了简单介绍，并说：“谭启龙与陶铸有联系。”

康生同志说：“哪个红卫兵报说陶铸的罪状之一就是保谭启龙！”“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在说青岛问题初步解决以后，谭启龙有个文件就不对头，意思还是进一步整学生，分化学生。”我们说：“他最提倡抓‘一小撮’。”

康老说：“这是陶铸、王任重的意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是参加他（谭启龙）那一个组的。我听了一下谭启龙的讲话和王效禹的讲话。他的抵触情绪很大，对王效禹是敌视的。这个可以看出来，因为王效禹发言时，他还插话。他不赞成王效禹的讲话。”……我们还说：“康老的身体很健康！”康老笑着说：“越斗争越健康！”

后记：……这个谈话是王力、关锋两同志去《人民日报》以前讲的。……

外地赴青革命造反团 王世歧整理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

### 附件 3

#### 苍茫大地 我主沉浮（摘要）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晚，冯起带着他“三院一校”的代表到了王效禹家里。王效禹认为夺权时机已成熟，提出了联合起来夺权。冯起、牛家骥等不同意，而提出了建立所谓“三司”并以之推动青岛文化大革命的高论。王效禹当时曾尖锐地指出：青岛的各院校，“八·二五”事件以前成立的红卫兵，相当于北京的“一司”，职工红卫兵总部及第一总部就相当于北京的“二司”，而大中学校联络总部……，如“青医东方红”等，经过这几个月长期艰巨斗争实践的考验……吻合北京“三司”，如果你再另立门户搞什么“三司”，其实就是搞分裂，……然而牛家骥们不接受。时针已指午夜二点，王效禹第一次搞的包括冯起、牛家骥们参与的夺权……宣告不欢而散。……

元月二十日晚，“青岛轻工分部”召开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一举夺下了

轻工局一切党政财权。

几千“青岛轻工分部”红卫兵战士高扬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乘胜追击，向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市人委发起了勇敢地挑战：要夺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市人委的大权。王效禹出席大会，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

元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多，崂山东方红、青医东方红、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轻工分部等组织代表乘车从轻工分部往东急驶而去，直奔太平角，在湛山路二号（注：湛山二路2号）会议室召集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轻工分部、崂山东方红、青医东方红、青岛东方红、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公安局革命造反联络部、市级机关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八一革命造反兵团、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文艺界造反联络部等）联席会议……

杨保华代表轻工分部首先发言。分析了当前形势，以轻工分部造反派提出了当前青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键问题——夺权。其他代表都先后发了言，各个介绍当前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纷纭的现象，共同讨论……

会议是秘密进行的，由杨保华主持。王效禹发言，他说：我们要坚决地把原来旧市委的旧框框、旧东西彻底打烂，把十五年来刘、邓所搞的苏联修正主义的那一套统统踏倒，要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联合其他革命阶层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市委、市人委一脚蹬开。我们造反派要有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气魄，我们工人阶级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建立一个指挥全市的领导班子，领导要以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建立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合一的，党政合一的新型组织，就可以缩小“三大差别”。是否搞个总的“青岛东方红公社”，彻底砸烂旧市委……

问题的看法。“江山只有争斗之理，没有撤退之理。”不能搞宫廷政变，搞折中，搞改良，不能那样雅致。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嘛！可能要流血。对于顽抗到底，对抗毛主席，对抗人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于现行反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专政机构来对付，杀他一批，关他一批，管他一批，没有专政，就没有民主。

怎么个夺法，具体怎么夺，还没有个数。……下一步怎么走？我心中也还没数。……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干脆都不要，搞一个统一的政法机构代行执行专政职能。不要那一套，全都是苏联修正主义的东西。检察院没有用，我当省副检察长时就知道没事干，只有跟公安局找麻烦。……

……坚决夺旧市委、市人委的权。……最后，确定这个组织的名称：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

什么时候夺？大家一致同意在第二天十一点整采取行动，事先保密，所属各组织集合在新建礼堂。忽然大家听说第二天要召开全市揭发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大会，服务团的四位同志来找杨云良商议第二天大会事宜。突然有人提出干脆利用这个大会，妙极了！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作战方案，就定了。……

会议开到下午三点散会，并各个负责通知更多的革命组织代表参加晚上的扩大会议……

晚十一点，有十九个革命造反组织代表到会，王效禹也来了，委托大中学校总部起草的致敬电、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派杨云良同志取回，时针已指十二时半。杨保华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注：《苍茫大地 我主沉浮》约 15000 字，牛奔东起草，主要叙述策划筹备“1·22 夺权”的过程。

#### 附件 4

#### 告青岛全市人民书（摘要）

“东方红，太阳升”，我们迎着万丈朝霞庄严地宣告：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诞生了！从此，全青岛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由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从青岛市委、市人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黑手中夺过来了。这是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几个月来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是青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开端，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的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洪涛巨浪，……我们青岛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听从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召唤——要关心国家大事，……进行到底！我们起来大造旧世界的反，向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正当青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猛地燃烧起来的时候，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但当他们惊魂稍定之后，便疯狂地跳了出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一手策划了“八、二五”、“九、一”反革命事件。他们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左派，把许许多多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实行白色恐怖，把青岛市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对全青岛市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十六条”，以及

《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时候，那些资产阶级官老爷们，不但不疼（痛）改前非，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猖狂地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一面搜罗和拼凑御用的“红卫兵”，大举围剿革命造反派；另一面，则不惜动用政法机关，大搞特务活动，直到去年年底还不断编造、窝藏黑材料，妄图“秋后算账”。他们还假借“抓生产”的名义，压制革命，打击革命群众，不准工人、农民起来造他们的反。而当着革命工农群众揭发了他们的阴谋，勇敢地起来造反之后，他们又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支持革命”的幌子，纵容在职人员大量外出串连、“告状”，并且大搞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资财和人民血汗，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了新的猖狂的进攻，阴谋软化革命群众的革命斗志，企图把异常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最近，他们又对革命造反派封官许愿，笼络收买，企图分化革命左派队伍；并以“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要求为名，大“罢”一般基层干部的官，肆无忌惮地破坏党的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导演“舍车马，保将帅”的骗局，制造混乱，……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罪责，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他们如此慷国家之慨，损人民之利，无非是要破坏生产，制造混乱，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用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掩盖自己的丑恶灵魂，保住个人的“乌纱帽”，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起了猖狂反扑。我们革命造反派绝不能置若罔闻，袖手旁观，绝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文化大革命以来，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教育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小撮反动分子之所以能从各个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发动猖狂的进攻和反扑，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我们革命造反派，不夺这个权，就不能获得彻底解放，就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不夺权，就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历史使命，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夺权，就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夺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颜色，无数革命先烈为党为人民流血牺牲所换来的胜利成果，就要付诸东流，我们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

总之，一句话，我们要夺权！夺权！！夺权！！！只有把权夺过来，才能彻底摧毁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

青岛市委、青岛市……早已处于瘫痪状态，当前青岛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都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同时，一些保守组织的铁杆保“皇”分子和冒充“左派”的人物，……抓住左派组织的某些缺点错误，大做文章，制造流言蜚语，混淆视听，混水摸鱼，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制造反对派，企图瓦解左派队伍，打击革

命群众，争夺政权，严重地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粗暴地破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阻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紧要关头上，我们革命造反派能置之不理吗？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我们必须也只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在革命造反精神的共同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造旧青岛市委、市人委的反，夺他们的权，把一切权力牢牢地掌握在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手中！我们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毛主席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砸烂一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反动机构，要彻底捣毁所有的反动的资本主义的专政机器，让那些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什么“书记”、“市长”，什么“部长”、“局长”，都统统滚蛋；什么“市委”、“市人委”，什么“法院”、“检察院”，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的革命造反委员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它要沿着毛主席所开辟的革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曲折的。我们不但要善于夺权，还要善于掌权。尽管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一切支持革命造反派的群众团结起来，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一定能抓好生产，促好生产，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正如毛主席在全国胜利前夕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我们革命造反派……要做新青岛的主人。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分子……发抖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革命造反派！

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口号略）

青岛东方红

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

青岛市化工企业革命职工联络总部

青岛市“八一”革命造反兵团

铁道部四方机车厂工学指挥部

山东省革命职工联络总部青岛联络站

青岛畜产品公司红色造反联络总部

青岛市粮食局第三粮库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青岛革命工农造反军联络总部



青岛市邮电局东方红战斗兵团  
青岛市遵义公社  
崂山东方红公社  
青岛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部  
青岛医学院东方红公社  
山东海洋学院中南海兵团  
山东化工学院东方红联络站  
青岛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色敢死队  
青岛航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青岛市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部  
青岛市公安局革命造反联络部  
青岛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总部  
外地赴青学生革命造反团  
鲁迅大学（原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反修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注：“告人民书”1月21日由“大中学校总部”起草初稿，被否定，牛奔东等重新起草，22日10时修改完毕乘车到汇泉广场，夺权大会11时开始。此件原载1967年1月24日《青岛日报》，但与22日大会的不一样，原件上有19个造反组织，因为不知道“三司联络站”已退出，原件上仍有“三司”（参考“附件7”）。1月22日晚反夺权派冲击《青岛日报》印刷厂，拆毁版面，23日报纸没有刊登“夺权”的消息。王效禹23日主持会议，“畜产红总”等5个造反组织在会上提出要求参与“夺权”，王效禹表态同意。这5个组织，加上22日夺权的18个组织，1月23日正式确定参加“青岛1·22夺权”的组织为23个。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删去原文中“让那些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什么‘书记’、‘市长’，什么‘部长’、‘局长’，都统统滚蛋；什么‘市委’、‘市人委’，什么‘法院’、‘检察院’，都统统见鬼去吧！”这一段，在其它地方增加“社会主义”等词汇。

#### 附件5

####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摘要）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夺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特作如下通令：

一、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完全归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所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予以封闭，停止其一切活动。

二、前青岛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各部委负责人，前青岛市人委市长、副市长、各局、处长，自本通令公布日起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其它一般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听从指挥，照常工作。

三、前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发出的一切指示、文件（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除外），自即日起一律作废。

四、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青岛市各级党政机关、工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单位和各群众团体的权力，凡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一律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夺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领导人员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而尚未改正错误的人，无权夺权。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号召全市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积极协助监督执行，对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依法予以惩办。

六、号召全市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彻底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七、由于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委员会郑重宣告：对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所发出的一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拒绝执行。并呼吁全省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6

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色敢死队

一九六七年第一号通令

经过调查，我们认为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根本不能代表青岛市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无权接管青岛市委和青岛市人委。特此通令

青岛日报社不准刊登与此有关的稿件。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青岛日报社完全负责！特此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注：“海院主义兵敢死队”1967年1月22日至27日之间共发布10个通令。此处选登第一号通令。

附件7

###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青岛联络站 就“1·22”大会的严正声明

一、我联络站根本没有在大会发表的“告青岛全市人民书”上签名，也根本没有参加所谓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

二、对大会策划者盗用我联络站名义的卑劣行径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大会策划者必须肃清由此产生的恶劣影响，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大会策划者承担。

三、我联络站坚决支持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革命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

四、“一·廿二”大会是一个政治大阴谋，这个大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我们认为：青岛市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必须由青岛市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掌握，绝不允许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来操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三时

附件8

### 从“1·23”黑会看王效禹（摘录）

一月二十三日坐落在偏僻的太平角的一座神秘的大楼里，开着一个名符其实的黑会，……会上，王效禹大讲这次夺权的经过。他说：这次夺权是轻工分部杨XX同志首先提出来的，我坚决支持，筹备会我是被邀请的。……

会上，王效禹讲：“权夺过来了，就得有坐镇的。花果山上要坐个孙猴子嘛。”并具体吩咐如何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如何办公等等。于是在会上当场点名拼凑了一个只有五、六个人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

王效禹吩咐到会者要到基层做宣传解释，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与反对的意见辩论。他说：你们青岛东方红就可以训练一批联络员，下去做宣传。……向王效禹汇报，当天是如何如何把 XX 组织拉了过来。会上凑了一下“战功”，这就是 24 日《青岛日报》刊登的“告全市人民书”落款的单位由原来十八个增加二十三个的内幕。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驻青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注：23 日会上第一次确定市造委常委组成人员“五、六个人”，王效禹指定杨保华、张汉祥为常委召集人。

#### 附件 9

##### 特大号外

中央文革关锋同志给王效禹同志的电话：

已经通知第三司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开支持你们。你应该公开出面，和他们一样公开出来，不要在后台。对反动组织，为首分子要镇压，对受蒙蔽的同志要争取。新华社要转播你们的消息，你们要把材料报到中央文革。

青岛东方红公社《不怕死》战斗队印

1967 年 1 月 28 日晨 1 时

#### 附件 10

##### 李水清回忆录（摘录）

1967 年 1 月 23 日，军区一份特急电报呈到我和陈继德政委面前。……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在中央各新闻媒体广泛宣传。……

经常委研究决定，1 月 25 日下午，军里派政治部副主任林之岐同志来到“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后统一改称“革命委员会”），跟几位造反派头头郑重表示，六十七军支持青岛的夺权行动。……

1 月 29 日（注：应为 27 日）晚，约近 200 名反对青岛夺权的群众组织代表，再次打着红旗高呼口号拥（涌）至武定路 29 号军机关大院，要求部队领导接见。……围绕王效禹领导的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正确与否，双方展开激烈辩论。群众代表坚持认为，王效禹在青岛夺权是错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他们

为部队支持夺权深感惋惜，甚至骂我们“可耻”。

正吵的不可开交，约晚 10 时许，军司令部值班室接到中央军委文革直接打给六十七军首长的电话，齐威让刘文秘书代接。这个电话，正式传达了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文革的三点意见：第一，青岛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第二，六十七军要支持青岛的夺权斗争，可以派部队全副武装上街游行。第三，请直接将这些意见转告王效禹同志，让他从暗中支持造反夺权的“后台”转入“前台”。齐威看过电话记录，当场让刘文秘书向闹事者宣读中央军委文革的电话通知。许多人听后一下子就愣住了，打蔫了，这场风波即刻烟消云散。

注：回忆录书名《从红小鬼到火箭兵司令——李水清将军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 版。

## 附件 11

### 潘焱 1967 年 9 月 23 日在北海舰队常委扩大会的检查（摘录）

1 月 27 日晚六十七军电话转告我，总参转中央文革的电报说：王效禹同志由后台到前台。我们公开支持时，仍一面布置 28 日和陆军同时游行，一面又向李军长打电话问还有电报来没有？有什么另外的安排吗？

注：这是 1967 年 9 月北海舰队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第 29 号文件。李水清给潘焱打电话，转告中央军委文革的关于支持夺权的通知，潘焱认为是“总参”转发的电报。

---

## 【编读往来】

## 边犊：2014 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 一、部分“老三届”的“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讨论会。

2014 年 1 月 4 日，北京一些文革时期的“老三届”中学生举行了一次以“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为主题的讨论会。与会者主要毕业于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和清华附中。先是原八中学生、文革初期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陈小鲁代表八中老三届校友向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公开道歉。此举社会影响极大，毁誉皆有。受此举影响，远在美国的原师大女附中校友叶维丽（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议，女附中与陈小鲁等同时代人共同举行一次讨

论会，共同反思那段历史。提议受到热烈响应和支持。电子刊物《记忆》与女附中校友共同组织了这次讨论会并作了详细报道。

## 二、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有关文革史教学研讨会。

2014年3月13日至14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了“新中国历史教学与史料研究现状及展望”研讨会。与会者主要是在一些高校任教并重点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他们的发言主要有：金大陆《文革课程的前途——兼谈“我们要告诉学生什么？”》，董国强《本科生和研究生“文革”教学的差异》，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史课程建设的历史与经验》，陈明明《“旧制度”与“大革命”：文革史的政治学分析》，高红霞《上师大国史教学现状及对国史教学的若干思考》，王海光《干部教育中的文革史教学》，唐少杰《讲授文革史论课的一点体会》，黄延敏《文革社会文化史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与思考》，金光耀《关于文革史料搜集、整理和利用的一些浅见》，印红标《文革群众出版物存藏现状与整理》，冯筱才《中国当代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如何进行——以文革资料为例》，丁东《回忆录、口述资料的收集、鉴别与运用》，叶青《收集、解读、考辨文革史资料的心得与思考》等，有的学者还就不同主题作了多次发言。

## 三、孙海英建议设立“文革省”。

2014年6月，著名影视演员孙海英在其微博上发文建议设立“文革省”，把喜欢文革时代，愿意回到文革时代的人集中在一起。实际是添加一个国家旅游点，供世界人民游览，又增加国民收入（门票参考十三陵或故宫）。孙海英认为建“文革省”的好处有：1. 可大量消化1990年以前积压的军用报废物资（军装等）；2. 可建一个大型印刷企业，印袖标、语录（解决就业）；3. 建一个万人文工团（愿意的均可以通过考试进入，教游客忠字舞，并给游客天天演出红歌）；4. 爱骂人的，通过骂人考试进入特区辩论队；5. 爱打人的考进武斗队。“文革省”工作按1966至1968年模式：游街，批斗，外调，揭发，划清界限，跨省长征、辩论、武斗、群众专政，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红歌），排队、凭票买煤买副食品，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看三个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看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背“老三篇”和毛语录。

“文革省”夜生活流程是：吃忆苦饭（野菜树根粥），家庭晚汇报，跳忠字舞，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下半夜至凌晨等最新“最高指示”广播后上街欢呼游行撒传单（号外）……许多网友跟帖，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加以完善。

## 四、宋木文建议对文革选题图书的管理做出调整。

2014年8月15日，《文汇报》1528号头版发表独家特稿：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的宋木文所写的《管理“文革”选题图书的回顾与进言》，在对文革选题图书出版的管理作了回

顾之后，提议在新的形势下，对文革选题图书的管理作出调整，由出版单位自主决定是否出版并负全责。认为“从总体上看，现在探索并做出此项适当调整，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有利的。”

#### 五、《当代史资料》第二期被收回重印。

2014年7月，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四川研究所主办的内部刊物《当代史资料》2014年第二期（季刊）发表了原成都一基层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丘先甫的回忆录《我这七十年》（下），刊物印出并分发后，被个别主管人员认定此文后面部分（对个人在“揭批查运动”中的遭遇的记叙及相关感想）有“严重政治问题”，下令收回重印。

#### 六、最早批判文革本质的汉学家李克曼去世。

2014年8月11日，著有《毛主席的新衣》的汉学家皮埃尔·李克曼(Pierre Ryckmans)于澳大利亚悉尼家中逝世，享年78岁。李克曼（1935年9月28日—2014年8月11日），本名皮埃尔·里克曼斯，出生于比利时，笔名西蒙·莱斯(Simon Leys)。《毛主席的新衣》于1971年以法文出版，李克曼以编年史形式回顾了从1967年2月至1969年10月文革的高潮，重点提到文革的成因皆源自权力斗争。在西方还普遍沉迷于中国幻觉中的时候，李克曼就揭露了文革的本质：破坏了中国文化，却未摧毁文化中应被去除的暴虐与专制。

#### 七、习近平在纪念讲话中谈邓小平在文革中的经历。

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追述邓小平的历史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直到1973年复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久，他再次被错误撤职、批判。

#### 八、社科院院长重提“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

2014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旗下的《红旗文稿》刊发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声称：目前“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其论调与文革中的官方宣传如出一辙。凤凰网等以《社科院院长：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为题在首页转载，引发舆论极大关注，社交媒体一片嘲讽之声，一些网民惊呼“文革回潮”、“狼来了”。

#### 九、广东文革风云人物武传斌去世。

2014年9月24日，文革中广东省的风云人物、红卫兵领袖武传斌在加拿大

多伦多医院去世，终年 70 岁。武传斌，河南省济源县人，1944 年出生于贫农家庭，文革时为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学生。中大学生会体育部长，文革前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文革中任“中大八三一”和“广州红司”的一把手，是广州文革造反派“红旗派”的领军人物，曾作为“红旗派”代表之一参加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 年 2 月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时经中央批准担任常委。文革后遭到清查，1981 年广东省委正式结论：武传斌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年 12 月，广东省人大会议决议宣布解除武传斌省革委常委职务。以后武传斌主要在广东省惠州地区从事专业工作，有多项技术创造和发明专利，并多次得到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政府颁发的科技贡献立功嘉奖证书。2002 年退休后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他对当年因为响应毛的号召，造反“大乱广州”，给社会生活带来不安，令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失，感到万分歉意。更对武斗中不幸死亡的群众（包括自己学校两派的两位同学），感到深深的内疚。临终前他已经完成口述回忆录的讲述及修订。

#### 十、文革中的 1976 年“四五”运动领导者之一陈子明去世。

2014 年 10 月 21 日，著名政治学者陈子明因胰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 62 岁。陈子明追悼会于 10 月 25 日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约三百人出席。陈子明生前好友郑也夫代表社会各界致悼词，高度评价陈子明为中国民主、宪政所作的贡献。文革中陈子明曾参与领导“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六个谈判代表之一，也是著名的“小平头”之一。

#### 宗庶：2014 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据不完全统计，在 2014 年里以文革为题材的出版物（包括其中有较重要文革内容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有——

王小妮著《1966 年》，东方出版社，2014 年 1 月。

李海文著《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 1 月。

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年 1 月。

徐明清著《明清岁月——徐明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 1 月。

丰一吟著《爸爸丰子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 1 月。

安建设著《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 年 1 月。

李近朱编著《邮票上的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年 1 月。

施燕平著《尘封岁月》，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 年 1 月。



- 从维熙著《我的黑白人生》，生活书店，2014年1月。
- 梁秋川著《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
- 许学受口述《回首九十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14年1月。
- 吴志菲著《墙上的集体记忆》，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
- 鲁光著《沉浮庄则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4月。
- 汪曾祺著《人间有戏》，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
- 汪耀华编《“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1976）》，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4月。
- 王克明、宋小明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
- 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6月。
- 滕叙兖著《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
- 叶笃义著《虽九死其犹未悔》，群言出版社，2014年7月。
- [美]周锡瑞著，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译《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
- 虞云国著《放言有忌》，华夏出版社，2014年7月。
- 孙兰芝、张从、奚学瑶、丁广举主编《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第二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8月。
-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
-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1949—1974）》，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
-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中国妇女》，同济大学出版社。
- 沈昌文著《也无风雨也无晴》，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
- 梁漱溟著《梁漱溟日记（下册 1966—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
- 张聿温著《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北京出版社，2014年9月。
- 金冲及著《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
- 萧冬连著《筌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
- 《杨成武年谱》编写组《杨成武年谱（1914—2004）》，解放军出版社。
- 由港台及美国的华人出版社出版的有——

- 郝斌著《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2014年1月。
- 叶志江著《走出文革》，（美国）溪流出版社，2014年2月。
- 顾建棠著《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香港银河出版社，2014年2月。
- 齐家贞著《黑墙里的幸存者：父女囚徒镇反文革纪事》，（台湾）新锐出版社，2014年2月。
- 启之编《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台湾）独立作家，2014年3月。
- 李白茂著《毕竟东流去》，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3月。
- 蒯大富著《清华文革五十天》（第二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3月。
- 聂树人著《“逮捕审查”与看守所纪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3月。
- 聂树人著《“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亲历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3月。
- 吴称谋主编《历史的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
- 宋永毅序《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明镜出版社，2014年3月。
- 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4月。
- 卢叔宁著《一个黑五类的文革自述：苦难、不屈与求索》，（台湾）酿出版，2014年5月。
- 程光编《邱会作家书》，明镜出版社，2014年6月。
- 黄肇炎著《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
- 李正权著《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
- 叶青等著《非常十年论稿》，（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
- 张建成著《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
- 杨闯著《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
- 吴一庆著《边缘地带的文革：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

6月。

王文耀、王保春著《“文革”前后时期的陈伯达——秘书证言》，（香港）天地图书出版 2014年7月。

顾耀文著《明日黄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8月。

杨海英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 2014年10月。

阳增泰回忆，何蜀整理、注释《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11月。

何蜀主编《真相与反思——〈昨天〉2013年精选》，（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11月。

。

### 谢保安谈刘殷农回忆录

44期《昨天》上刘殷农的回忆录节选稿我读得很细，一经展读就放不下来，说明它很有吸引力。最难得的是，他的回忆充满细节，不仅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而且再现了文革亲历者真实的思想情感，非常难得，弥足珍贵。我在阅读时也常常情不自禁地产生联想和共鸣。听说他的回忆录还没有写完，我相信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按这种写法写下去，把他所经历的文革各个阶段都写出来，一定会很成功的。